

第三章 中國周邊安全及政策選擇

第一節 中國領導人對周邊安全威脅認知

中國是一個陸海大國，但由於陸上資源豐富，生存空間大，故歷經朝代的演進，中國建立以小農生產為經濟基礎的中央集權封建政經體制，使中國缺乏向海洋謀求經濟利益的社會動力，故傳統中國在政策上重陸輕海。而歷代王朝主要威脅來自陸地，長城的走向標誌中原農業文明與北方游牧文明的分界線，長城兩側是中央王朝與北方游牧民族交戰的主戰場。中國屬於歐亞大陸地緣戰略區，背靠歐亞大陸，面向太平洋，處於兩大戰略區的交接處，既受其他大國關係影響，又影響其他大國關係。中國有 2.2 萬多公里長的陸地邊界，1.8 萬多公里長的大陸海岸線。中國有為數眾多的鄰國，對中國安全造成不同的影響，與中國接壤的 15 國依次為朝鮮、俄羅斯、蒙古、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錫金、不丹、緬甸、老撾、越南。在海上與中國相鄰的國家除朝鮮和越南外，還有韓國、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 7 國。有的鄰國間積怨深，嚴重對立，一旦他們彼此間發生戰爭或武裝衝突，必將影響中國邊境安全。有的國家內部不穩定因素增多，一旦發生內亂對中國邊境造成壓力。有的國家居民與中國邊境地區的居民屬於同一民族或信仰同一宗教，可能引起中國國內的民族與宗教糾紛。還有一些國家與中國間存在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界領土爭議和海洋國土劃界爭議，存在引發邊界事件和武裝衝突隱患。¹

西方工業化發展後，各國之軍事技術和航海能力粉碎中國封建統治者依賴陸上天然屏障的安全感。直到近代西方列強從海上大舉入侵，才迫使中國開始重視對海上的防禦。一九六〇年代，中國面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尤其在中蘇兩國交惡後，中蘇雙方軍力對比強弱懸殊，中國只能採取誘敵深入的方式對付可能的侵略戰爭。中國海軍的任務也只能配合和保障以陸軍為主的陸上防禦，從而形成一支近岸防禦型海軍力量。²

冷戰時期，如何處理與兩大超級大國的關係是中國國家安全政策的中心問題，中國根據形勢的變化和自身安全的需求，多次調整安全政策，曾從一面倒向蘇聯轉向聯美抗蘇。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處於歐亞大陸心臟區的俄羅斯雖然暫時力量衰弱，但仍然是世界第二軍事大國，他的重新崛起只是時間問題，與中國同處在歐亞大陸東部邊緣的日本，經濟實力佔世界第二

¹ 張萬年主編，《當代世界軍事與中國國防》，軍事科學出版社，北京 1999.12，頁 121-129。

² 同上。

位，軍費開支佔亞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並向政治大國邁進，中國處在這些大國交接處，如何看待周邊安全情勢，如何做出正確選擇，處理與美、俄、日三大國及鄰國的關係，不僅關係到中國自身的安全，而且關係到東亞、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安全與穩定。³

尤其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與國際社會接軌之後，雖然取得快速經濟成長，有效克服內部結構性經濟危機，但在周邊安全方面，卻仍存在某些戰略弱點，第一、改革和開放策略造成中國逐漸依賴海外市場、海路貿易以及海外能源等。第二、改革開放終結毛澤東時代的三線建設，將中國重要經濟中心集中在東南方沿海地區，容易受到外國海軍攻擊。第三、一九七 至一九八 年代南韓、日本、台灣、越南和印度等國跟隨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潮流，競爭力日益提升，中國試圖將西藏、新疆等傳統邊陲納入控制受到挑戰。⁴故張萬年等中國黨政軍領導人認為，中國周邊地區熱點問題逐漸降溫，但仍存在爆發危機的可能，而這些安全威脅包括朝鮮半島問題，印巴衝突對立，領土主權爭議，美國在亞太地區部署戰區防禦導彈等問題。⁵以下分別探討中國領導人對上述威脅的認知。

一、朝鮮半島爭議

東北亞是中國安全利益生死攸關的地區，但東北亞各國因歷史與國家認同等因素而衍生敵對，可能掀起高科技軍備競賽，其安全環境日趨複雜。以朝鮮半島為例，南北韓雖未擁有如中國或日本般的大國地位，但兩者都不是東北亞政治中俯首聽命之輩，一九九四年南韓國防預算一百卅億美元位居世界第八位，其擁六十萬常備軍位居世界第六位；而平壤是美國定位的流氓國家之一，其具有在中國邊界引發一場毀滅性戰爭的能力。一九九四年金日成去世，對北韓和北京而言必須防止北韓政權崩潰，一旦南韓併吞北韓不僅對中國意識形態形成挑戰，甚且是戰略威脅，中國抑制平壤對南韓採取軍事冒進行為，用武力統一朝鮮半島。朝鮮半島安全情勢若出現快速變遷則非常危險，可能轉變成衝突、戰爭，對韓國人而言是災難，此亦威脅中國安全，危及亞洲甚至世界安全。中國看待朝鮮半島主要基於安全考量，中國認為朝鮮半島是一個重要的緩衝區（buffer zone），此亦即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四年中國反對聯合國制裁北韓的原因。中國主要關心某一大國利用韓國領土威脅中國，而不擔心兩國單獨向中國形成挑戰，因為韓國緊鄰中國東北工業基地，且中韓兩國海岸僅相隔一百哩，而北韓作為緩衝國使得美國軍事

³ 同上。

⁴ 史旺（Michael D. Swaine），「解放軍現代化對中國與亞太的影響」，田弘茂、朱雲漢編，張鐵志、林葦芸譯，《江澤民的歷史考卷（China Under Jiang Zemin）》，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12月，頁133-136。

⁵ 同註1，頁129-138。

力量遠離中國邊境。⁶

一九九一年蘇聯撤出對北韓援助及貿易補貼，由於北韓資源配置主要集中於軍事與重工業，加上天候因素，社會主義經濟崩潰，尤其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造成北韓經濟的重創，徹底改變北韓政、經結構。一九九一年代北韓主要依賴中國石油、食物及衣物援助，同時在戰略生存上亦依賴中國。⁷一九九六年北韓向中國要求提供北韓 50 億人民幣之糧、油、運輸裝備、重機械、輕工業產品；要求中國提供 15 億美元採購軍事裝備，以取代蘇聯製裝備，並提供飛彈設備，中國只給 2 萬噸穀物。金日成致函江澤民和李鵬，要求重新確定一九六一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之權利義務，要求北京明確支持北韓勞工黨的北韓之原則和政策，要求雙方立即進行高層互訪。一九九六年六月北韓軍方代表金永男訪陸，要求深化與中國之戰略夥伴關係，中國承諾增援 15 萬噸穀物和 40 萬噸煤炭，唐家璇並在中朝雙方建交 50 週年赴平壤訪問。⁸一九九六年七月八日中國副總理鄒家華宣示，中國將派遣羅幹赴北韓，盡力提供援助，但先期聲明中國無法全數符合北韓需求，中國最後同意提供北韓 5900 萬美元物資援助，2000 萬美元十年期無息貸款，一九九六至二〇〇〇年間中國每年提供 50 萬噸穀物，130 萬噸原油。⁹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影響力主要來自於中國對北韓的援助，但北韓的國家行為並非中國所能控制。

中國希望朝鮮半島維持現狀，持續作為美在亞太駐軍與中國領土的緩衝區。但北韓發展核武的舉動破壞區域穩定，因為如此一來勢將核武引進朝鮮半島，此舉可能誘使南韓和日本發展核武。此外，一九九四年核危機和一九九八年導彈危機中，美國不斷強化美日軍事同盟和美韓軍事同盟的合作細節以及可操作性的作戰方案，以戰爭相威脅。¹⁰對中國而言，在美國步步深入朝鮮半島事務過程中，中國的影響受到削弱，並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一旦美國對朝鮮的戰爭威脅不斷加劇，中國的周邊安全亦承受巨大的挑戰。¹¹所以中國曾以停止向北韓出口石油或支持聯合國對北韓之經濟制裁威脅北韓，與華府共同勸說北韓放棄發展核武計畫。中國除關心朝鮮半島安全情勢外，美日在東亞的防衛部署計畫調整，

⁶ 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陸伯彬 (Robert S. Ross) 著，《長城與空城計：中國尋求安全的戰略》，何大明譯，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頁 147-148。

⁷ 同上，頁 160-165。

⁸ Sumuel S. Kim, " The making of China's Korea Policy in the Ea of Reform ", 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98.

⁹ Ibid., 386-387.

¹⁰ 高恒，「朝鮮半島走向歷史性緩和」，李慎明、王逸舟編，《2001 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02，頁 73-78。

¹¹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4 Spring 2003.04, pp34-44. 高恒，同上，頁 90-98。

亦挑動中國的敏感神經。

二、美日軍事圍堵

(一) 美日重新評估防衛合作指針背景

一九九 與一九九二年美國所提出的東亞：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報告建議，美國在亞太地區可以多裁減一些部隊。當時曾計畫要將美在亞太駐軍人數精簡到 9 萬人以下。¹²一九九三年柯林頓上任後，以重振美國國內經濟為優先目標，於是採取壓制貿易夥伴開放市場的政策，美國政府開始考慮改變其對內、對外政策。對內仿效日本提出產業政策構想，對外採取重商主義，並視日本公司侵蝕美國市場為威脅，使美日關係處於緊張狀態。但一九九四年四月底，美國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羅德（Winston Lord）向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提交一份備忘錄，認為美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已趨於全面緊張，面臨岌岌可危的地步。美國國防部部長助理奈伊（Joseph S. Nye）認為，日本及東北亞的戰略重要性與日俱增，於是敦請美國政府考量日本在美國長遠的國際戰略中之地位與作用，要求重視美日同盟對於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的重要性，並指出如果沒有美日安全體系承諾保持公海航行自由和現有邊界不可侵犯之積極壓力，中國就可能嘗試突破二百海浬之限制，並將南沙及釣魚台等爭議島嶼納入水域，所以不能將美國與亞洲盟國之關係視為冷戰遺物加以廢棄，而要締造一種更為平衡的同盟關係，以應付廿一世紀發展與變化。於是美國開始與日本官員討論新防衛計畫大綱，並重新評估美國亞太政策，以建立一個更為清晰的東亞戰略，闡明美國的承諾及利益，重新激發亞太各國對美國在該地區存在之信心，美日兩國並重新評估一九七八年美日防衛合作指針。¹³

一九九五年二月美國發表東亞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戰略報告，該報告評估，長期而言，中國的崛起是可以確定的因素，但東亞各國國內的政治變化對區域安全情勢之衝擊乃不確定性因素；短期而言，美日在東亞地區互有戰略需要，這是可以確定的因素，但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安全情勢乃不確定因素。故該報告建議，美國應維持在亞洲的同盟結構，以之作為地區穩定的基礎，作為美國在處理亞洲問題之手段。只要在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仍存在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美國均有充分理由保持其在該地區之存在，美國要保持全球領導地位，就必須保持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而要保持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就必須鞏固美日同盟。¹⁴

¹² 陳舟，《美國的安全戰略與東亞：美國著名國際戰略專家訪談錄》，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01，頁 5-10。

¹³ 俞正梁等著，《大國戰略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10，頁 55-70。

¹⁴ 同上。

九九六年四月十六日柯林頓訪日，日美首腦發表《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為面向 21 世紀的日美關係定下了基調，華府和東京通過一個共同行動計畫，要求日本在美日聯盟中擔負更大的軍事責任，並在全亞洲的共同防禦行動中承擔責任。對中國領導人來說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代表美國已將日本納入美國的全球戰略。該宣言的源起早在對台緊張之前即已確定，但該項聯合宣言係在台海爆發緊張關係後宣佈，故中國領導人判斷，柯林頓與橋本龍太郎的聲明係針對中國，中國外交部長飛抵東京企圖阻止東京與華府間的協議，但並未能成功。¹⁵

中國並非向來都反對日本的軍事發展。美日聯盟具有抑制日本軍國主義及維持東亞安定雙重功能，故中國一向遷就此一事實。¹⁶事實上，中國曾於一九七十年代鼓勵日本軍事發展，當時中國軍事領袖鼓勵日本提高國防花費以對付蘇聯的威脅，並鼓勵日本將其國防支出的比例提高三倍，如一九七八年九月鄧小平曾向日本訪問團表達其贊成日本自衛隊建軍。¹⁷在一九八十年代前，中國領導人將美在西太平洋之前沿部署、美日結盟、美在南韓駐軍視為東北亞力量均衡的積極因素，故美國亞太政策使日本和中國同時受惠，因為如果美國作為亞洲地區穩定力量的信譽降低，日本可能會擴充軍力以保衛其在亞洲其他地區之利益，促使中日軍備競賽，中日競爭將使全亞洲兩極化，影響大國聯合，朝鮮半島發展及中南半島與東南亞穩定。¹⁸但到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根據當時亞太戰略情勢變化。中國自一九八十年代末期開始，高度關注中國威脅論及美國圍堵中國等相關議題之發酵，開始重新檢討其支持日本軍事現代化的態度，中國領導人擔心美日安保條約將使日本重新走向軍國主義之路，故視美日一九九六年中美聯合聲明具有軍事聯盟性質，並擔心中國成為美國圍堵的目標。¹⁹

一九九九年七月日本首相小淵惠三表示，基於對歷史反省，日方堅持在和平憲法下走和平建國道路，堅持專守防衛政策，遵守和平憲法三原則，堅持不作軍事大國，這些基本原則今後也不會改變。²⁰但中國仍高度關注日美兩國聯合行動的範圍是否將擴大？日美兩國聯合行動的方式會否發生變化？日美同盟的矛頭所向究竟對準誰？日美同盟是制約還是掩護了日本增強軍事力量？

¹⁵ 傅高義 Ezra F. Vogel 編，吳福生譯，《廿一世紀的美國與中國關係（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89.8，頁 105-122。

¹⁶ 同註 6，頁 157-158。

¹⁷ 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中共對未來安全環境的辯論（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頁 161-168。

¹⁸ 同註 6，頁 166-167。

¹⁹ Joseph Yu-shek Cheng, "China's American Policy: A Turning Poin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ume 2, Number 2, Summer 1996, pp68-73.

²⁰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中國外交概覽：2000 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年，頁 42-44。

（二）美日聯合行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以來，日本一直宣傳採取「專守防衛」，日本政府反復強調，日美聯合宣言並不意味日美擴大軍事合作的範圍。但美日在《聯合宣言》指出兩國將研究當日本周邊地區發生事態影響日本安全時，如何聯合行動。日本政府決定將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中之「遠東」措辭改為「日本周邊」；將方針重點從「日本有事」改成「日本周邊有事」。日本防衛廳高級官員解釋說：這是一個比遠東更廣泛的概念。日本政府過去所謂「遠東」的概念，限定在菲律賓以北，而「日本周邊」及亞太地區則可能包括南沙群島等，故中國非常擔心此將導致日美軍事合作的地理範圍擴大。中國在一九九〇年代一直企圖取得美日承諾不要介入台海兩岸衝突，防衛台灣，並希望美國藉美日軍事聯盟限制日本軍力發展。²¹但日本官房長官堀山靜六卻表示日本周邊當然包含台灣海峽，假如美國部隊為台灣問題展開行動，日本不會坐視不管。²²

此外，日美簽訂《相互提供後勤支援、物資和勞務協定》使日美軍事合作的領域擴大到聯合國維和行動，預示著日美軍事合作在後勤保障方面將擴大到全球，此為日本軍事力量發展及日美軍事合作開闢一個更大的國際空間。²³

日本在一九九六年防衛白皮書中將確保日本周邊海域和海上交通的安全列為日本自衛隊的多種任務之一，日本內閣安全保障室同時開始研究如何保護日本海外僑民及配合美國保衛海上航線等可能事態。²⁴

（三）日美兩國聯合行動的方式

《日美防衛合作指導方針》係一九七八年日美針對蘇聯威脅所制定。嗣後，日美雙方不斷研議在日本周邊發生衝突時，日本自衛隊能否對正在作戰的美軍飛機和艦艇補給燃料，並參與海上封鎖、船舶護航、公海排雷、搜集情報、後方支援等。此一發展可能使日本突破憲法限制，擁有與美聯合作戰的「集體自衛權」。日本主流派意見認為修改《指針》要在現行憲法允許的範圍以內進行，不同意行使集體自衛權。但日美軍方仍可能以朝鮮半島形勢緊張等為由，確定雙方在日本周邊發生衝突時合作的新方式，以解決當美國在日本周邊地區發動攻擊或受到攻擊時，日本以何種形式參戰的問題。若日本通過重新解釋或修改憲法，擁有與美國聯合作戰的「集體自衛權」，並允許日本在軍事上介入周邊地區衝突，將意味

²¹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4 Spring 2003.04, pp.34-44.

²² Ibid. 劉江永,《1996-1997年日本形勢報告, 戰略與管理增刊》,北京,1997,頁33-49。

²³ 劉江永,同上。

²⁴ 同上。

著日美安全關係發生質變，日本有可能介入國際衝突，並使用武力。中國擔心，日本的角色與功能擴大，將進一步刺激軍國主義的發展與右派勢力成長。²⁵

中國軍事學者張召忠分析日本在台海問題的角色時指出，日本在其戰略中已將台灣列入周邊事態法案中。此法案表明只要日本週邊有事，日本必定會出兵干預，究竟怎麼干預，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屆時會動手。從美日關係來看，美日兩國在一九九六年簽署安全防衛指針，標誌只要美國一動手，日本肯定幫忙，在美日聯合作戰中，日本的幫忙將主要表現為提供軍事基地、後勤支持和物質保障，海空搜索救援，情報信息支持等。即使美國不動手，日本也會捲入，因為符合日本周邊事態法案。日本防衛廳認為，不僅周邊發生武裝衝突或戰爭的時候日本會出兵干預，即使某個周邊國家內部發生什麼動亂、暴亂或不穩定的局勢，日本也有可能進行武裝干預。中國認為日本捲入台海衝突的可能性非常大，其介入方式可能故意破壞海空封鎖、通過行使海上航行自由權故意引發衝突，然後升級為戰爭。²⁶

（四）日美同盟矛頭指向誰

蘇聯威脅消失後，日美同盟的對象業已發生變化，日美兩國陸續謀求與中國改善關係，故在日美《聯合宣言》中，只將朝鮮列為不穩定因素，《聯合宣言》雖未明確提出《中國威脅》，但中國對日美同盟戰略意圖仍耿耿於懷。²⁷

首先，一九六〇年修訂後的《日美安全條約》第六條中規定，為維持遠東國際和平與安全，日本將為美國提供設施和區域。而此次修訂不僅未將台灣排除在聯合行動範圍之外，反而通過「聯合宣言」將雙方軍事行動範圍擴大到亞太地區，中國擔心此意味著南沙海域將被包括在內。²⁸

其次，一九九六年三月中國在台灣海峽軍事演習時，駛入台灣海峽附近海域的美國「獨立號」航空母艦以日本橫須賀港為基地的。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四日美國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J. Perry）對日本報界表示：美國向台灣海峽派出航空母艦，意在表明維持西太平洋的安全，對美國的國家利益來說具有決定性重要意義，為此美國準備使用軍事力量。翌日裴利又對日本記者說明：面向 21 世紀的日美安全保障體制的主要課題是對付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的不穩定局勢。²⁹

第三、日本朝野各黨不斷有人主張，一旦台灣海峽發生衝突，美國介入時，

²⁵ 同上；同註 17,頁 179-181。

²⁶ 張曉霞，《中國高層智囊》，修訂版（二），京華出版社，北京：2000.09，頁 216-217。

²⁷ 同註 23。

²⁸ 同上。

²⁹ 同上。

日本作為盟友也將對美提供支援。一九九六年日本《防衛白皮書》在形勢分析上，進一步突出對於中國的論述，指出中國推進核戰力和海空軍力量的現代化，擴大海洋活動範圍，在台灣周圍進行軍事演習，進而導致台灣海峽局勢緊張等動向有必要加以注意。³⁰

第四、一九九六年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提出《安全環境長期預測及日本防衛的應有狀態》內部報告，將中國作為防範對象。該報告對中國海空軍力量的增強表示強烈關注，並預判到二〇一五年南中國海將成為中國海，屆時麻六甲至巴士海峽的海上航道將隨時受到中國的威脅。防衛廳隨之擬定發射首顆偵察衛星計畫，加強對鄰國軍事情報的獨立蒐集能力。³¹中國認為日本將與本地區各國構築同盟以遏制中國。

（五）關注日本軍事力量增強及軍國主義復甦

日本為落實《新防衛計劃大綱》，軍費開支在一九九五年增長率為 0.86%，一九九六年增長 2.58%，總額達 48,455 億日元，與美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預算總額相差無幾。一九九七年度日本軍費開支高達 49,475 億日元，增幅為 2.1%，遠遠超過當年日本一般歲出的 1.5%，數額乃日本對外政府開發援助的 4 倍多。根據《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畫》規劃，在二〇〇〇年之前，日本的軍費開支逐年遞增，軍備繼續擴充。日本自衛隊武器裝備繼續走向高技術化和現代化。中國認為日本擁有 18 艘大中型潛艇、批量生產的 F2 新一代支援戰鬥機、100 架 P3C 反潛預警機等，已跨入世界最精良軍隊之列。有「變相航空母艦」之稱的 8,900 噸級運輸艦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下水，使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單艦運輸量提高 2 倍；該艦可起降直升機，裝運最新的德式坦克，具有登陸作戰功能。另在一九九七年更新保護美航空母艦的護衛艦，大量引進與美聯合研制的 F2 戰鬥機，擴充直升機預警體系。³²

美國軍方曾將美日安全關係比喻為限制日本成為軍事大國的瓶塞。但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分析指出，美日安全關係乃日本發展軍事力量的一種最好的掩護，起到了小雞孵化過程中「蛋殼」的作用。日美安全關係對日本擁有核武器可能是個「瓶塞」，但對日本發展高科技常規軍事力量則是一個「蛋殼」，日美《聯合宣言》表明其「常規蛋殼」的功能將更趨增強。日本正在日美安全關係的掩護下，走向高科技常規軍事大國道路的。尤其蘇聯威脅消失後，日美兩國正在聯合研究提高導彈速度與射程技術、潛艇鋼板超深海銲接技術和戰車低耗能高馬力引

³⁰ 同上。

³¹ 同上。

³² 同上。

擊技術，引進新一代支援戰鬥機，並與美國共同研究是否部署戰區導彈防禦系統。³³

美日安保關係是區域安全關係，也是全球夥伴關係，其目的在維持一個兵力投射能力，以嚇阻任何潛在的侵略者。美日軍事合作是以維護區域安全為基礎，但中國高度關注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駐軍及美日同盟關係是否在美國處理台灣問題時構成中國的安全威脅。³⁴

中國對日本可能再度成為一個區域安全大國保持高度的敏感，中國軍事現代化旨在嚇阻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行動，其主要目標在於降低美國介入中國對台用兵的可能性。中國對於美日防衛合作指針重新修定過度擔憂，誇大其為害性，在另一方面美日誇大共軍總體實力，都可能導致中、美、日三方陷入安全困境。³⁵此外，中國在周邊安全上仍面臨領土主權爭議，一九九〇年代釣魚台及南海問題衝擊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

三、領土主權爭議

（一）釣魚台問題

一九九四年日本國會要求日本政府公開重申對釣魚台領土要求，北京乃派出石油鑽井船到爭議水域，並警告日本不要採取挑釁行為。一九九六年中日兩國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後，釣魚島主權之爭再起，日本右翼團體日本青年社於七月十四日登上釣魚台北小島，設立燈塔，建造木製日本國旗，以彰顯日本主權。經中國政府多次交涉與嚴重抗議，以及港台抗議活動的升級，日本政府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對國內右翼團體加強了控制，並向中國表示，不支持、不承認右翼團體的行為。但日本防衛廳開始以保衛釣魚島為由，要求添購空中加油機。而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美國高級官員表示，根據美日安全條約第五條，一旦日本周邊有事，美國對日本負有防衛上的義務，美國將遵守這一諾言。該條約明確記載了日本在防衛上對美國的要求，即在防衛上支援日本領土及日本行政管轄範圍內的領土。而根據一九七二年，美國歸還沖繩協定中具體寫明釣魚島屬於日本行政管轄

³³ 同註 17，頁 161-168。

³⁴ 日本的自我認知其不可能永遠處於目前的地位，最終他會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擁有自己的軍隊，問題是，外界如何對待此一情況。日本變化的速度、變化的方向，必須要讓那些對日本歷史不滿的鄰國能夠接受，中國與日本共同合作，會有助於日本使這種變化非常緩慢地、漸漸地步入正常，產生一種緩和效應。美國與日本合作，其鄰國就不會向日本獨自行動那樣緊張。日本不可能獨自與中國進行抗衡，為了在與強大的中國進行合作的同時，確保中國不通過武力達成目的，必須保持強大的美日同盟。美國沒有日本也不可能與中國在亞洲地區抗衡，在與中國不斷增長的實力與能力相抗衡這一點上，美日有著共同利益。同註 15，頁 105-122。同註 12，頁 146-148。

³⁵ 同註 12，頁 137。同註 15，頁 105-122。

範圍之內。日本報界指出，此乃美國政府高官首次公開表示日美安保適用於釣魚台，此種以「日本行政管轄範圍內」表述形式，不直接涉及主權問題，既照顧到中國又堅持了日美同盟。³⁶

（二）南海問題

中國目前的領土係歷史的產物，最初乃帝國向外擴張，後來是同其他國家發生衝突所界定的邊界，當代中國領導人在民國時代所用的地圖，其領土便涵蓋南沙群島。如果北京承認東協相關國家擁有該群島的領土要求，將威脅中國對其他地區領土爭議問題所宣示立場的可信度，故南中國海的領土衝突，成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發展密切關係的主要障礙。在南海主權爭議的歷程中，因為各國認為佔領乃領土要求合法化最有利的基石，故除中國之外，聲稱對南沙群島擁有主權的國家還包括台灣、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汶萊；印尼聲稱其擁有納土納群島（Natuna Island）主權，上述國家不斷搶佔該地島礁，越南目前在南沙群島中佔有最多島嶼，而台灣、越南均宣稱擁有整個南沙群島。³⁷

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越南支持中國擁有南海主權，主要基於希望獲得中國對抗美國；一九七三年南越宣示西、南沙為其領土，一九七四年中國宣示其對西、南沙附近島礁擁有主權。一九八八年中越因南沙群島（Spratly Islands）主權問題再度發生衝突。一九九二年中國與美國的克里斯通能源公司（Grestone Energy Corporation）達成協議，在爭議水域鑽探石油；越南則與 Mobil 公司簽署類似協議，河內為擺脫中國影響，開始開展多元外交，一九九五年與美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並加入東協組織。³⁸一九九二年中國通過領海毗鄰法，中國聲明對南海地區之海上航道、漁場和 underwater 資源擁有主權。一九九四年九月發生美濟礁事件，菲律賓逮捕五十五名中國漁民；一九九五年二月中國在島上建立防衛基地，菲律賓向中國提出外交抗議。此外，中國並根據海洋法規定，對西沙群島做精細勘查，於一九九六年公佈精確數字，界定其擁有的西沙群島的每一個島嶼，以及環繞每一島嶼的十二海浬的主權，如此一來其邊界將擴展到馬來西亞、汶萊和菲律賓沿海水域，對上述各國的安全構成挑戰。³⁹

³⁶ 同註 23。

³⁷ 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China's Security The New Roles of the Military*,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8, p.78；同註 6，頁 187-189。

³⁸ 中國估計南沙油藏約 20-40 億噸 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op. cit., pp.260-266; Alastair Iain Johnston, op. cit., pp.25-30。

³⁹ Marvin C. Ott, "The Dragon's Reac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ed Galen Carpenter and James A. Dorn eds., *China's Future: Constructive Partner or Emerging Threat?*, Cato Institute, 2000, pp.115-118.; 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op. cit., pp.260-266.; 同註 6，頁 187-189。

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雖已關係正常化，但其安全問題並未解決，南海問題在一九九〇年代乃中國與東南亞各國衝突的導火線。中國對東南亞各國外交戰略目標主要在排除主要大國在該地區擁有壟斷性的影響力，故在南海主權爭議上，中國極力反對國際化，堅持透過雙邊交涉解決。⁴⁰南海問題不僅僅是中國與東協各國的雙邊問題，海上交通線的安全乃美國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關注的焦點。在一九九〇年代，美國與東亞國家的貿易額每年高過 4000 億美元，其投資額已超過 1000 億美元，東南亞和南海海域乃美國經濟發展的一條重要生命線。日本 90% 以上的原料和物資經由海上運輸，如果中國獨斷專行，以武力作為主權宣示後盾，並強化區域投射能力，與東南亞各國衝突或戰爭，危及南海海域海上交通線安全，勢必引發各主要大國介入，破壞中國和平穩定的周邊安全環境。⁴¹

中國處理南海問題的方式，乃東南亞及各主要大國檢驗中國是否成為各國威脅的重要指標。東南亞各國擔心的並非中國攻佔南海領土，而是一旦中國在當地影響力擴張，各國必須服從中國的戰略利益，屆時東南亞各國決策均不得危及中國利益，任何政策動向調整均須獲得中國首肯，此乃東南亞國家所不樂見並擔憂的情況，所以東南亞各國日益關注中國對緬甸、寮國及柬埔寨日益增加的影響力。⁴²而地處南亞的印度與中國，兩者基於過去邊境衝突所產生的歷史敵意，使彼此刻意擴大對方的威脅。

四、中印爭端

中國對南亞安全環境的評估，主要集中在中印關係互動。對中國而言，印度具有挑戰動搖中國對西藏統治地位之能力，中國一直將印度視為爭奪南亞地區領導權的主要對手。中印兩國在東印度洋及南中國海彼此的軍事意圖與野心相互衝突，中國在緬甸西海岸可可斯（Cocos）島上建立雷達站，該雷達站與印度安達門斯（Andamans）海軍基地相距不遠。此外，中國透過經濟援助，在緬甸地區建構一條貫穿南北的鐵公路建設，可通行坦克，所以印度高度懷疑中國的企圖。⁴³

冷戰結束後，此一局面並未改變，中印邊界因高山峻嶺地形，故有約 2500 哩未曾界定邊界，但此成為中印兩國能否建立良好睦鄰關係的關鍵。

中國在評估印度未來發展及其國際角色時，經常強調印度具有威脅性的軍事

⁴⁰ Ibid.,

⁴¹ 同註 26，頁 219-224。

⁴² 東南亞各國擔心形成 Chinese Monroe Doctrine for Southeast Asian, Marvin C. Ott, op. cit., pp.115-118.

⁴³ Selig S. Harris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Asia: The "Threat" in Perspective" in Ted Galen Carpenter and James A. Dorn eds., "China's Future: Constructive Partner or Emerging Threat?", Cato Institute, 2000, pp.96-98.

潛能以及印度民主制度的不穩定性，且一直認為未來中國與印度將形成嚴重的對立；中國對於印度未來發展前景判斷，影響中國對於來自印度威脅的認知。中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張長泰認為印度將成為一個新崛起、不容忽視的強國。中國學者華碧雲甚至分析印度的軍力在世界上排名第四位，且印度因擁有 300 萬名科學家與技術人員，其人數僅次於美國與俄羅斯，在世界排名第三位，此科技大軍乃印度珍貴智慧資源，在國防研究與武器生產方面，將扮演決定性角色，所以預判未來印度的軍事力量還會持續增強。但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陳啟懋則認為，到廿一世紀初，印度都不可能成為世界的一極。一九九三年九月中國與印度雖針對雙方領土爭執簽訂信心建立措施協定，但中國學者認為兩國間仍有許多將造成雙方形成地緣政治對立之因素：如中國因關切印度的核子與飛彈發展而出售 M-11 飛彈零組件給巴基斯坦；中國對印度暗中支持西藏獨立感到憤怒；印度則指控中國在克什米爾爭執中扮演破壞性角色；中國加強對印度鄰國進行軍售；一九九九年五月中國軍事科學院彭光謙警告，美國將利用印度來遏制中國。⁴⁴

但不管印度未來的興衰，中國相當關切印度國內的宗教極端主義組織在印度政治運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該等組織對印度內政與外交政策之影響。尤其關注印度人民黨 BJP 執政期間，曾訴諸印度民族主義以爭取印度人對核子試爆之支持，作為反制中國核武威脅的籌碼。一九九八年印度核試驗時，印總理致函克林頓表示，印度此舉主要針對中國，中國學者認為印度此舉力圖聯美反華，並企圖以其核子大國的地位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二〇〇一年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表示，與印度有利害關係的地區將從阿拉伯海北部擴大到南中國海，並計畫與韓國和越南在南中國海進行軍事演習，中國非常擔心印度將中國威脅論變成事實。⁴⁵

中國與巴基斯坦的關係向為中國南亞政策關鍵，對北京而言，新德里是一個

⁴⁴ 中國對印度的批評主要從以下切入，血緣論者認為印度領導人因為與英國佔領者有血緣關係，故吸收繼承英國之帝國主義思想，並暗示印度依賴西方國家的援助，代表印度被西方收買。亞洲中心論者認為尼赫魯所追求的目標是建立印度歷史上空前的大帝國；且印度中產階級從英帝國主義者接收印度乃亞洲中心的觀念。歷史因素論認為印度佛教對中國固有信仰形成挑戰，印度龐大人口與領土對中國造成壓力，一九六二年邊境事件以及印度迫害境內華人；一九八七年中印再度爆發小規模軍事衝突。在領土爭執的背後，兩國之間長期存在敵對狀況，且又因印度發展核武與彈道飛彈使兩國關係更形惡化，據評估，印度軍事科技發展已將中國大部分國土置於其核彈頭攻擊範圍內。印度政府在一九九八年五月核子試爆後，隨即提起中國的威脅，此證明中印間歷史仇恨仍持續發揮影響力。誠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尼赫魯致函周恩來所指，中國一旦強大就會向外擴張，並認為即使印度對中國展現最大善意，仍無法改變中國這一個強權盤據邊境的事實，且認為中國大陸農作物年年歉收，已產生爆炸性的危險情勢。煽動論認為一九五〇年西藏境內的叛亂活動，背後有印度對達賴之支持與煽動，中國指此乃印度與美國中情局合作所致。此外，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的閻學通非常擔心印度將中國威脅論變成事實。同註 17, 頁 188-194。

⁴⁵ 同註 17, 頁 188-190。王金存，「世界大國關係動向」，李慎明、王逸舟編，《2001 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02，頁 48-49。

潛在的戰略對手、一個核子國家及領土歸屬的爭議者，中國擔心印度控制巴基斯坦成為南亞霸權，進而對中國安全形成挑戰，中巴兩國共同反對印度在該地區稱霸企圖，中國不惜代價支援巴基斯坦，藉以制衡印度。⁴⁶中國極力譴責印度核試，但中國對巴基斯坦發展核武則持相對寬容態度，認為巴基斯坦核武計畫乃對抗印度最經濟的方法。⁴⁷在一九八〇年代初，中國提供巴基斯坦核武及核處理設備藍圖，一九九一年美國憑藉衛星影像判讀，指控中國資助巴基斯坦發展核武能力，輸出 M-11 導彈科技，但中國聲稱其嚴格遵守核武不擴散政策，所以在一九九一年提出聲明反駁，指其與巴基斯坦係核能合作非武器生產。中國並對外宣稱其未向兩伊及阿根廷輸出核武相關技術，但獨漏巴基斯坦。中國主張 M-11 飛彈輸出並未違反飛彈科技管制體制（MTCR）相關規範。一九九一年九月中國同意遵守 MTCR 禁止出口射程在 300 公里且能攜帶 500 公斤彈頭之飛彈科技出口；並於一九九二年二月簽署書面協定，中國同意不對巴基斯坦等不接受安全查核國家輸出核設施，並執行一系列核出口規範。美國同意撤除一九九一年六月以來禁止中國代為發射衛星及相關科技貿易禁令，但儘管有此保證，CIA 仍指控中國破壞 MTCR 輸出 M-11 零件給巴基斯坦。一九九六年年初美國發現巴基斯坦空軍基地部署 M-11 導彈，美國再度祭出制裁手段，美國下令進出口銀行對在中國大陸之美商企業不再給予貸款保證，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一日中國再度做出保證，不再出售可作為裝載核武用途之科技或裝備給類似巴基斯坦的國家。⁴⁸一九九〇年代，中國持續向巴基斯坦提供中程彈道導彈，旨在保障巴基斯坦在戰略上獨立於印度。

蘇聯崩潰使中印在反對美國控制聯合國、對抗美國人權外交具有共同利益，使兩國得以談判解決邊界衝突，並進行領導人互訪，但中印關係解凍並未結束中印競爭，中國在印巴爭鬥間，仍是南亞次大陸的斷層線，中國若為改善與印度關係犧牲與巴基斯坦關係，將導致中國被排擠出南亞地區，為了使巴基斯坦繼續成為南亞地區抗衡印度的力量，中國對巴基斯坦的軍事援助益形重要，北京必須讓巴基斯坦放心，中印和解不致威脅巴基斯坦安全。⁴⁹

印度在經濟、軍事以及科技勝都略遜中國一籌，儘管如此，印度在南亞一直

⁴⁶ 一九六三年中國同巴基斯坦形成非正式聯盟，使印度在發生衝突時必須面臨兩線作戰，中國並援助巴基斯坦秘密研製核武，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 Yahya Khan 並為中美傳遞秘密資訊；此外，一九七〇至八〇年代初，中國與尼泊爾、不丹、斯里蘭卡、孟加拉等國進行對話的積極外交路線，試圖利用彼等以抗衡印度勢力，但印度亦不斷對這些國家施加影響力，使巴基斯坦成為中國在南亞唯一倖存的戰略夥伴。Selig S. Harrison op. cit., pp.105-106. 同註 15，頁 105-122。

⁴⁷ 同註 17，頁 193-194。

⁴⁸ Bates Gill,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Nonproliferation and Arms Control Policy- Making: Broadening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But Only to a Point", 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67-269.

⁴⁹ 同註 6，頁 194-196。

是積極的政治和軍事參與者，印度企圖加強他的軍事能力以對付中國對他的安全威脅，中國和印度之間對亞洲霸主的持續競爭，中國軍事專家指控印度企圖成為南亞霸權。如果中國對印度此種評估成為中國大陸主流想法，將升高為印度洋或中印邊境上的軍事對抗。⁵⁰

五、美在亞太地區前進部署

在一九九〇年代亞洲各國逐漸強烈感受到中國經濟與軍事之影響力，亞洲各國對中國崛起雖未出現正面對抗抵制行為，但各國領導人對此仍感到憂慮，亞洲國家不論是個別或聯合起來都不足以制衡中共，沒有任何一個亞洲國家僅憑一己之力能與中國抗衡，故需尋求美國保護傘。只有美國在此一地區維持均勢，使各國均能充分自由地採取各種適切的外交、政治與經濟措施。但此類觀點並不必然假設中國必定會成為一個威脅，而是企圖作為一個預防措施或保險政策，以避免日後與中國相互對抗。⁵¹

美國基於其國家利益，在亞太地區其主要的戰略考量在於，第一、美國擔心亞太地區國家所擁有的軍事力量和這個地區核擴散的趨勢，會給美國的生存安全帶來威脅。第二、擔心亞太地區的矛盾、衝突和其他一些不穩定因素會威脅美國海外基地和海外通路的安全，再次將美國拖入一場類似朝鮮、越南戰爭。第三、美國擔心在亞洲的經濟利益受到侵害。第四、美國擔心亞太地區出現某個強大的戰略對手，對美國在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領導權威提出挑戰。第五、美國擔心美國式民主和價值觀在亞太地區遭到抵制。故美國積極扮演一種亞洲能接受的角色，參與亞洲事務；設計一種符合美國利益和戰略意圖的地區安全機制；保持前沿軍事部署；操縱亞洲大國間的關係，保持亞洲的力量均衡。⁵²

美在亞太前沿部署影響中、日、韓及整體區域權力平衡，日、中關係，衝擊朝鮮半島穩定，台灣問題、南海爭端、多邊安全及 TMD 等問題均影響區域安全。⁵³一九九〇年代整個亞太地區正陸續汰換老舊武器，美國如放棄在太平洋地區扮

⁵⁰ 喬夫 (Ellis Joffe), 「人民解放軍與政治」, 田弘茂、朱雲漢編, 張鐵志、林葦芸譯, 《江澤民的歷史考卷 (China Under Jiang Zemin)》, 台北: 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 12 月, 頁 122-126。Zahmay M. Khalilzad, Abram N. Shulsky, Daniel L. Byman, Roger Cliff, David T. Orletsky, David Shlapak, and Ashley J. Tellis, 吳福生譯, 《美國與崛起中的中共戰略與軍事意涵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台北: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民國 89.10, 頁 57-58。

⁵¹ 同註 15, 頁 149-152。

⁵² 洪兵著, 《國家利益論》, 軍事科學出版社, 北京: 1999.07, 頁 157-165。

⁵³ Taeho Kim, "China's Evolving Bilateral Ties in nor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gional Strategic Configuration", in Jaushieh Joseph Wu, *China Rising: Implication of Economic and Military Growth in the PRC*,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01, pp.193-206.

演的安全角色，可能演變成為一場全面的軍備競賽。⁵⁴

根據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二日美國國家利益委員會公佈的美國國家利益報告指出，中國短期內還不會對美在亞洲的領導地位構成挑戰，認為與中國建立建設性關係是美國在東亞攸關生死的國家利益之一。該報告強調美國在東亞最大的立即威脅不是中國會成為霸權，而是台灣海峽及朝鮮半島爆發局部戰爭的危險。⁵⁵

美國為防止中俄的導彈發射系統發生意外、中俄政府失去對少數發射系統的控制或以發射戰略導彈作為報復手段，以及一些反美國家或國際犯罪集團將美國作為導彈打擊對象，故積極建構導彈防禦系統，阻卻戰略導彈攻擊美國本土⁵⁶美國建構 NMD 主要係為制止那些無賴犯罪性和誤射攻擊。美國部署 TMD 主要針對波灣地區，其的目的旨在保護人群聚居點和城市免遭恐怖主義襲擊，確保美軍能將部隊集結到海空基地等地域，以便展開部署，一旦 TMD 技術得到完善，就會用於世界各地的美軍部隊。⁵⁷在研發過程中，日本商業利益集團認為投資 TMD 的相關技術會帶來技術副產品。日本防衛廳部份人士認為，日美在 TMD 之合作對於美日同盟關係健康發展至為重要，且一旦發生台海衝突，TMD 可作為削弱中國對日本政治軍事影響的手段。故積極參與美國發展 TMD 相關環節。⁵⁸

世界上除中國之外還有許多國家擁有彈道導彈，這些導彈可以傷及美國的部隊。雖然中國有能力製造出更多可以打擊美國的彈道導彈，但中國擔心美國具有導彈防禦能力後，中國的核力量將會失效，屆時美國將會挑釁中國，對中國進行懲罰。⁵⁹ TMD 研發構想不是針對中國，但中國對此非常敏感。尤其中國認為日本與美國一起研製與開發 TMD 系統，將為日本走向軍事大國道路創造條件。⁶⁰

美國在亞太地區駐軍、部署戰區導彈防禦系統，是否威脅到中國的導彈報復能力，關鍵在於，中國領導人將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制止大國在靠近中國邊境地區建立戰略存在、保持有限的第二擊核威懾能力視為中國生死攸關利益。⁶¹

北京尤其關注美國將戰區導彈防禦系統轉移日本或台灣，中國認為此舉將威脅其辛苦建立的彈道導彈、巡弋飛彈與戰嚇阻系統，並認為這種行動將助長區

⁵⁴ 同註 15，頁 105-122。

⁵⁵ 同註 12，頁 224。

⁵⁶ 美國國內反對部署的人指出，導彈防禦系統理論上雖能攔截陸基導彈的攻擊，但他不能給美國帶來真正的安全，她不能對付從海上發射的巡弋導彈及形形色色的恐怖活動。洪源，「軍備與軍控的重大形勢」，李慎明、王逸舟編，同註 10，頁 124。

⁵⁷ 同註 12，頁 63-66。

⁵⁸ 同上，頁 128-129。

⁵⁹ 同上，頁 86-90。

⁶⁰ 同註 10，頁 86-88。

⁶¹ 同註 12。

域性武器裝備競賽，迫使中國增加國防現代化支出，TMD 系統可以進一步加強對台防護，減少常規導彈對某些特定地點的破壞。台灣擁有低層導彈防禦系統，可以攔截短程導彈。但 TMD 無法保護台灣免遭中國大陸的導彈攻擊，因為中國大陸的導彈、誘餌和突防措施太多，攻擊距離又那麼短，中國大陸能夠壓倒台灣所擁有的任何 TMD。⁶²一旦發生台海危機，美國和日本可以將機動性高層導彈防禦系統調往台灣地區，台灣加入高層 TMD 系統不會對台灣的軍事安全有大的改進，但台灣加入高層 TMD 系統的政治影響大於軍事影響，因為台灣的加入意味著台灣的防禦體系與美日的防禦體系平時的一體化程度大大提高，故中國擔心 TMD 系統可能為台灣走向獨立提供一個屏障。⁶³

第二節 中國周邊安全政策選擇

中國歷代王朝之皇帝治國，策略非常務實，當中國面對強大、潛在或真正的敵人對抗時，其仍以中國為中心，將對敵納貢偽裝成宗主國的賞賜。在中國歷史中大部分時期，各王朝對控制既有地理核心地區或消弭直接威脅的關切，一直勝過開疆闢土或廣泛地將權力與影響力拓展到疆域之外的野心。中國朝代的創建者通常盡量以優勢兵力為後盾，企圖建構一個宗主權關係，以取得支配鄰近周邊地位，確保外部的安全。中國各朝代斷斷續續地將當今東南亞的北部與朝鮮半島視為中國戰略周邊的一部份，而一直到清朝時，中國才首度察覺大陸東方與南方濱海地區、台灣、日本和俄羅斯遠東等接壤的海洋地區戰略價值。因此，中國各朝代大部分時期，所指戰略周邊主要包含與大陸疆界接壤的內陸地區，中國歷來極力安撫與控制這些周邊地區，旨在防止中土遭到攻擊，控制鄰近內陸地區貿易路線。當中國處於衰弱時期，中國依舊透過朝貢體制努力維持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象徵性秩序，以維持中國政策的合法性，並寄望嚇阻潛在的敵人。一旦朝代更迭，皇帝內部統治穩固之後，往往對西南鄰國用兵，收復於衰弱時期或前朝喪失的周邊地區，但當遇到敵人頑抗時，則該戰役可能綿延數十年。⁶⁴

一九九〇年代，蘇聯崩潰，中國來自北方鄰國的威脅消失，過去聯美制蘇的戰略格局不再，同時，自一九八九年六月起，中國因天安門事件受到來自美、日、歐等各國制裁。在此期間，中國在周邊地區面臨朝鮮半島核危機，美日修訂安衛防衛指針，印巴核試及釣魚台與南海等爭議，中國如何做出政策選擇。江澤民在

⁶² 同註 12，頁 182。

⁶³ 同上，頁 102-103；Yoichi Funabashi, Michel Oksenberg, and H. Weiss, *An Emerging China in a World of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Trilateral Commission, 1994, pp.139-140；同註 10，頁 86-88。

⁶⁴ Zahmay M. Khalilzad, Abram N. Shulsky, Daniel L. Byman, Roger Cliff, David T. Orletsky, David Shlapak, and Ashley J. Tellis, 吳福生譯，《美國與崛起中的中共戰略與軍事意涵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89.10，頁 41-48。

一九九七年相關講話勾勒中國周邊安全政策選擇的藍圖，其指出，從國際形勢看，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世界格局正在加速走向多極化，一九九七年外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通過高層互訪，中國與美、俄、日、法等大國，確定雙方關係未來發展的目標和指導方針。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係繼續加強，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進一步鞏固和發展，與亞太經合組織、東協等區域性組織的關係取得重要進展；這有利於保持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良好國際環境及周邊環境，也有利於促進和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有利於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和擴大國際影響，在國際鬥爭中處於更加主動的地位。⁶⁵在一九九七年中國確實與主要大國及區域組織建立不同類型的夥伴關係，其信心加強，但仍以國際鬥爭形容其外交環境。其主要政策作為包括開展大國外交、參與區域安全機制、擱置主權爭議、啟動睦鄰友好外交。以下將分別敘述其政策背景與內涵。

一、開展大國外交

一九八九年以後，國際格局的不確定性及中國領導人繼承問題衝擊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第三代領導人承受人民要求改善生活的壓力，此乃中共政權合法性所在，故中國必須與鄰國保持友好關係，而中國若企圖透過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獲取國家利益，代價非常大。中國已成為資本主義的一部份，改革開放不可逆轉，故須與美、日、歐、俄等大國保持良好關係。而中國對大國關係曾有如下分析，鄧小平於一九九一年指出未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與歐盟及日本經濟競爭與矛盾將日趨尖銳，取代過去北約和華沙對抗。⁶⁶

一九九二年九月錢其琛赴中國中央黨校為中國高級幹部作「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個問題」報告，強調：一、冷戰結束後，出現有利於中國經濟建設和發展的局面。但是，阻礙中國發展的最大障礙是來自美國的干涉。倘若中國和日本及亞太各國能進行充分而有效的協調配合，中國是有能力抵擋美國干涉。二、要正確運用日美之間的緊張關係，使中國對日、美的外交活動有利於中國，並在亞太諸國的交往中掌握主導權。三、在構築中、美、日三角關係中要保持三者之間必要的平衡。⁶⁷

從上述分析發現，中國領導人理解美、歐、日間戰略利益差異，此提供中國在大國間合縱連橫空間。⁶⁸中國陸續與俄、美、日等大國建立戰略夥伴或睦鄰友

⁶⁵ 江澤民，「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159。

⁶⁶ Joseph Yu-shek Cheng, "China's American Policy: A Turning Poin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ume 2, Number 2, Summer 1996, pp51-57.

⁶⁷ 楊中美，《中共外交教父錢其琛》，台北：時報文化，1999.06，頁170-171。

⁶⁸ Joseph Yu-shek Cheng, loc. Cit.

好合作關係。

(一) 中美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

1. 中國領導人對中美關係之認知

美國與中國之關係究竟會全面為敵或兩者有妥協互利空間，此乃美中關係研究學者關注的焦點。⁶⁹李鵬於一九九五年曾指出，美國對中國搞西化、分化，從根本上講，他不願意看到中國強大，但是他做為資本主義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搞改革開放，也還要和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打交道，從他們那裡得到高新技術，先進的管理方法。我們不能同他們把關係搞壞。我們和美國的關係總結出兩點，一個叫做不好不壞，一個叫做鬥而不破，要清醒地認識到美國想遏制中國的發展，這個政策不會變。⁷⁰

從李鵬上述講話可以理解，雖然中國政經實力不斷增長，但美國在推動或阻擾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擁有其他國家無法望其項背的實力。在軍事上，美國能對中國在台灣或韓國的核心利益挑戰，但中國無法使自己的區域外交關係避開中美經濟或軍事衝突。一旦雙方關係惡化，美國可從其盟友獲得支持，但中國從世界各國獲得市場與技術的機會將受影響。中美關係衝突升高，將損害中國利益；美國若撤出在亞太地區之前沿部署，中國一樣受害，且將面臨新的安全挑戰，日本的財富加上技術具有可怕的軍事潛力，俄羅斯存在復甦的可能性，即使到一九九五年，中國對美國在「六四」之後的各項制裁，對台軍售、人權議題及智慧財產權談判等議題之態度與作為仍充滿敵意，認為美國想遏制中國發展，中國領導人極力阻止中美關係衝突加劇，係基於從美國獲取資金及先進技術之需要，仍須和美國打交道，故須維持鬥而不破的方針。錢其琛在一九九二年年末外交形勢報告中即下達對美政策新方針：「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⁷¹

江澤民於一九九五在美中協會等六團體舉行的午餐會上發表演講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兩國都具有世界影響的大國，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負有重大責任，中美兩國經濟有很強的互補性，因此雙邊經貿合作一直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影響中美關係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是台灣問題。⁷²中美兩國關係的指導方針，一、

⁶⁹ 同註 67，頁 183-184，

⁷⁰ 李鵬，「要為深化改革和發展經濟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人民日報出版社，北京：1997.12，頁 1614-1615。

⁷¹ 同註 67，頁 183-184。

⁷² 江澤民，「走向新世紀的中國與中美關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544-1546。

堅持用戰略眼光和長遠觀點來審視和處理中美關係，牢牢把握兩國關係大局。二、積極尋求共同利益的匯合點，既要考慮自身的利益，也要考慮對方的利益。三、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這是發展中美關係的基處。四、本著相互尊重、平等協商、求同存異的精神，正確處理兩國間的分歧。五、妥善處理台灣問題。⁷³此一講話明顯表達中國期待兩國關係能夠求同存異，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俾使中美關係良性發展為中國長遠的國家經濟建設目標，維護中國的主權和安全。

中國不願同美國對抗，但在涉及主權和重大經濟利益的問題上，妥協的餘地是有限的。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向江澤民和錢其琛表示中國在處理人權問題要柔，處理香港問題要剛，處理台灣問題要柔中帶剛。⁷⁴一九九二年八月布希宣佈對台出售 150 架 F-16 戰機，相較於法國對台出售 60 架幻象 2000 戰機，中國反應並不激烈，北京僅有限退出參與 MTCR 之協商，因中國領導人對布希較為信任。但北京在香港主權移交問題與英國談判及對法國對台出售 60 架幻象 2000 戰機乙事所採制裁措施較為強硬，主要係唯恐英法兩國對台和對香港政策可能的鬆動製造嚇阻，發揮展示效果（demonstration effect）。⁷⁵

2. 美國對中美關係之認知

在一九九〇年代美國各界對中國在全球及區域安全的角色之認知多所分歧。一九九七年二月，美國國防情報局局長休斯在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上指出，中國在今後 10 至 20 年將對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構成大規模的威脅。⁷⁶ 門羅（George Melloan）認為中國的戰略目標是破壞美國大國地位。季辛吉認為中國戰略行為是一個崛起大國正常行為，且此時乃美國與其建立夥伴的時機。⁷⁷前美國國防部長裴利在西雅圖演講中指出，交往（engagement）乃希望中國國際行動能夠像個負責任的大國的戰略；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柏格（Samuel R. Berger）指中美交往係為將中國拉進入國際共同體（international community），前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曾指出，美國與中國交往將影響中國，使其變成一個國際舞台有建設性的參與者，並尋求中國接受人權規範，依全球規範行動，建立一個安全的國際秩序。⁷⁸張立香（Julia Chang Bloch）建議美國政府必須承認

⁷³ 江澤民，「在美中協會等六團體舉行的午餐會上的演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67。

⁷⁴ 同註 67，頁 183-184。

⁷⁵ Joseph Yu-shek Cheng, op. cit., p58。

⁷⁶ 同註 23。

⁷⁷ Russ Howard, "Discussion of The Chinese Security Concept and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1), 10 (27), USA, pp.285-287.

⁷⁸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4 Spring

中國已崛起成為一個區域與世界強權，美國在其外交政策中應更進一步了解與增加中國的重要性。⁷⁹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太平洋地區政策中心主任包道格（Douglas H. Paal）認為金融、通信、製造與其他領域之全球化趨勢，構成強化中國與美國利益互補性戰略之重要來源。故其建議，美國的明確目標應是採取建設性措施，將中國全面性地納入國際社會，如此當可嚇阻中國以武力達成目標。

80

但中美雙方在一九九〇年代處在一個不對稱關係狀態。在區域安全穩定方面，中國欲確保一個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和平穩定國際環境，期全面提升綜合國力，仍有賴於美國繼續在亞洲發揮經濟和軍事影響力。美國對中國之依賴不似中國對美國依賴那麼深，因為美國並不依賴中國實現南北美洲、歐洲和中東和平，中美合作的利益僅限於亞太地區穩定和國際體系建構，但中美權力的不對稱性並未使美國佔盡上風不受挑戰，因為美國從中國市場開放中獲益，且在國際軍備控制、貿易、人權和全球污染防治體系仍需取決於中國的合作，中美不針鋒相對有助於亞洲區域穩定及美國防衛負擔減輕。⁸¹

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布希雖立即取消高層訪問、減少科技轉移、限制援助計畫，但卻秘密派遣國家安全顧問史考克羅（Brent Scowcroft）與中國談判，同時透過國務卿貝克取得中國支持聯合國對伊拉克出兵相關議案。但美國民眾對中共政權的負面態度，使大多數美國國會議員及政府官員樂於抨擊中國的人權紀錄。一九九二年布希於德州進行總統選舉活動，宣佈將出售德州生產的 F-16 戰機給台灣，中國將之解讀為違反美中所簽定的三個聯合公報。但由於布希向中方澄清並無意改變一個中國政策，中國隨即降低其反應。美國於一九九三年攔截並搜查一艘中國的船隻銀河號，美國雖一無所獲卻沒有道歉或賠償中方因船隻延誤造成的商業損失。一九九四年五月，美國行政部門對中國依舊冷漠，訪問中國的美國內閣官員一成不變地對中國人權問題施壓；中國政府及官方媒體也更加公開嚴厲批評美國，某些美國官員將之解讀為中國內部有歧見，需要藉批評美國來尋求團結。中國則認為美國的一些措施破壞雙方關係，中國將美國要求其賦予異議分子更多的自由及提供更多的資訊，視為干涉中國內政。美國在人權方面的壓力、銀河號事件、美國國會遊說阻擾中國主辦奧運、一年一度檢討最惠國待遇等作為，引發中國大陸內部反美情緒。柯林頓同意李登輝訪美，中國領導人認為他們無法指望美國維持一個中國政策，故必須採取強烈行動以防止台灣的獨立運動，雖然

2003.04, pp.5-12。

⁷⁹ 同註 15，頁 233-249。

⁸⁰ 同上，頁 105。

⁸¹ 同註 6，頁 141-144。

情勢緊張，但許多的中國與美國領導人仍願致力於重新建立一個更具建設性的關係。⁸²中美關係之發展誠如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王緝思所言，雖然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已經抹黑美國在中國的形象，但中國的外交政策實際並未受到他們的影響，因為北京對美國的態度係源自中國內部目標與需求。⁸³

柯林頓和歐布萊特自一九九六年開始以戰略合作、戰略夥伴關係形容中美關係，一九九八年夏天，柯林頓訪問中國大陸乃中美兩國關係之高潮，雙方發表聯合聲明，保證合作防止核武及彈道導彈擴散，共同負起提昇南亞和平與穩定的責任，柯林頓並在上海表示美國支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兩個中國、不支持台灣加入任何必須由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嗣後，美國財政部長魯賓（Robert Rubin）對中國在亞太金融危機之後保證人民幣不貶值給予正面評價，並指日本缺乏實際行動，此一說法讓日本感到錯愕。上述說明顯示美國視中國為亞洲事務主要的參與者，其背後意涵日本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正在衰微，而中國正在興起，中國不可避免的將成為區域的領導者，且比日本還能夠成為一個合作的夥伴關係。針對上述發展，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卡特（Ashton B. Carter）在當時評論指出，雖然歷史上所有的既存超級大國都傾向於把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視為自己的主要威脅，但美國不把中國列為主要威脅，中國現在不是威脅，將來也不會是威脅，雙方都有義務確保兩國不成為彼此的威脅。美國今天沒有任何敵人，中國不是美國的敵人，俄羅斯也不是。中國目前不是敵人，將來也不應該成為敵人。美國的主要任務就是防止美國與中國彼此為敵，此與到處尋找敵人的國家安全戰略相比，是不同的安全觀。中美兩國應努力成為夥伴而不應成為競爭對手，這就是預防性防禦思想的涵義。⁸⁴

而江澤民對中美關係亦做出評價指出，在一九九七年中美雙方確定廿一世紀中美關係框架和發展方向，決定共同致力於建立中美之間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標誌著兩國關係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但卻提醒要繼續保持清醒頭腦，因為中美關係發展不會一帆風順。⁸⁵

江澤民做出上述評價，主要在於中美兩國具有潛在衝突因子。一九九〇年代美中兩國既有共同利益，但亦存在重大歧異，共同利益其內容包括：一、安定的國際秩序。二、發展貿易與保留開放的國際市場，中國以進入全球市場中獲利，美國則以進入大陸市場獲利。三、加強國際組織，中國目前已是一個具有影響力

⁸² 同註 15，頁 9-13。

⁸³ 同註 64，頁 63。

⁸⁴ 同註 12，頁 49-55。

⁸⁵ 江澤民，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144-145。

的大國，協助中國及早準備參與國際組織符合美國利益。四、一個繁榮安定的中國，將促進區域穩定並鼓舞每一個貿易國家。五、和平解決台灣與西藏問題。歧異部分：第一、中國對領土完整與國家主權非常敏感，其認為台灣與西藏均是中國的一部份，且在地緣戰略上必須擁有台灣，中國軍方將美國軍事援助台灣視為持續干涉中國內政；美國堅決承諾一個中國，但許多美國人均同情台灣即達賴喇嘛希望獨立的心情。第二、南海爭議：南沙與西沙群島因容易遭到攻擊，而且面積太小無法建立深遠的基地，故戰略意義不大，中國對其領土主張並不影響美國海上交通線安全，但美國關切的是中國會不會以武力解決，故美國對東協國家保證在此地區之承諾。第三、國內經濟發展：外國廠商希望中國更進一步開放市場、更為透明化，增加可預測性，減少干預；中國則關注持續經濟成長與社會穩定。第四、多邊及國際組織：美國希望強化多邊組織，並在組織中追求美國國家利益；中國則是多邊組織為列強延伸影響力的工具，且對維持國際現存秩序之興趣不如美國。第五、亞洲潛在威脅：中國認為美日安全關係乃針對中國，而該條約增加任務及日本從美國採購新科技將對中國構成威脅；但美國認為與日本結盟可減輕美國的負擔並有助亞洲安定。第六、朝鮮問題：中美兩國都希望朝鮮半島非核化，但中國希望朝鮮半島成為一個緩衝區。第七、戰略同盟：中國協助巴國對抗印度，美國關心南亞穩定；中國希望與中東產油國保持良好關係，穩定油源；美國關心中國與伊朗、伊拉克及其他中東國家發展關係將使當地權力均衡與和平過程更趨複雜，此外，美國擔心俄羅斯向中國之軍售危及亞洲安定。第八、中美兩國都希望避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但都準備擱置國際規範與諒解來協助其盟邦。第九、人權：中美雙方對人權問題歧見極深，中國懷疑美國支持異議分子係為削弱中國的統一，並推遲中國崛起成為一個世界性強國，故在回應外國壓力時，常會變的好戰並不願與美國合作。第十、環境問題：中國官員願意與美國專家合作引進新的環保科技與經驗，但因其目前仍貧窮，希望快速經濟發展，缺乏無害燃料，故希望在經濟起飛前暫緩實施環境管制。⁸⁶中美蘇戰略三角格局消失，中國如何調整中俄關係乃中國區域安全政策非常重要的一環。

（二）中俄面向廿一世紀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中俄兩國過去因歷史衝突、相互懷疑使其無法尋求共同利益，從中俄兩國互動歷程中可以發現，由於中俄兩國在地理戰略上對彼此生死攸關之安全利益均形成威脅，雖然兩國關係曾因意識形態、文化、經濟及涉及第三國力量均衡等因素進行合作，但往往彼此總是在對方虛弱時才有安全感，一旦一方強大時，則對自

⁸⁶ 同註 15，頁 16-24。 Alastair Iain Johnston, op. cit., pp.22-25.

身安全關注便升高。⁸⁷

冷戰後中俄兩國關係之改善主要基於現實主義外交和地緣政治考量，且因為俄羅斯與中國均面臨少數民族分離主義運動之困擾，兩國均希望排除美國介入其內部之政治經濟問題。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學者認為俄羅斯國內雖有人口入侵、經濟突穿、軍事挑戰、地緣戰略衝突等因素阻礙兩國關係改善。但從文化論的觀點切入分析，俄羅斯具有獨特外交與文化傳統，加上其自認為強國的意識，東正教(Orthodox Eastern Church)特色等因素，使俄羅斯很難成為西方的一部份。中國戰略與管理學會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版之研究報告指出，自一九九二年以來，俄羅斯國內親西方激進份子已逐漸在俄羅斯政治舞台失勢，俄羅斯中國政策主流仍視中國為一可靠夥伴，並將擴大與中國的關係作為其外交政策中的優先要務。中國戰略家基本評估俄羅斯乃中國鄰國中最不可能向中國形成挑戰的國家，中國與俄羅斯關係將優於中國與美國關係，維持中俄良好關係發展有助於區域穩定與世界多極架構，因為雙方均堅持和平共處五原則。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劉靖華認為俄羅斯不與中國對抗，因此維持良好的中俄關係對中國有廣泛的效用，故主

⁸⁷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八年中國為防範美國的安全需求，採取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澤東訪問莫斯科，雙方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四日簽訂為期十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條約中規定中國若遭到日本或與之結盟的任何國家進攻時，蘇聯有義務向中國提供軍事和其他援助，美國乃此條約所針對的終極目標。中蘇對兩國所面對的共同敵人意見一致，但在雙邊問題上，莫斯科急欲保留控制蘇聯在殖民時期曾佔領的中國領土，而北京卻一心想消除殖民主義的遺跡，史達林雖然同意到一九五二年取消對長春鐵路的控制並放棄在旅順的基地，但仍強迫中國購買蘇聯在鐵路及其他合資公司中的股份，並要求保留蘇聯無限期使用大連港的權利，希望蘇聯官員在中國擁有治外法權，並排除其他外國人在新疆及東北從事商業活動，毛澤東對此一提議感到羞愧難當，故只有少數中國領導人被告知此一秘密協定，而在政治局表決時，毛澤東拒絕投贊成票。但蘇聯的支持乃中國歷史上最大一宗技術轉讓，此乃中國第一個五年計畫(1953-1957)成功的關鍵，並因而奠定國家工業經濟的基礎。一九五九年赫魯雪夫與艾森豪在大衛營會面後赴北京警告毛澤東不要用武力檢驗資本主義國家的穩固性，要求撤除其幫助中國收復台灣的準備，並建議中國使用和平方式統一台灣，考慮給予台灣暫時獨立的可能性。莫斯科不希望在中美對抗的祭壇上犧牲其與西方的和解政策，而莫斯科在中印邊界衝突又拒絕站在北京這一邊，蘇聯並反對中國大躍進。從一九六三年起，毛澤東親自指揮一系列論戰，開始痛斥莫斯科對馬列主義的修正，中國並將蘇聯控制其盟友的企圖稱為霸權主義或社會主義帝國，一九六三年當赫魯雪夫與甘迺迪簽署限制核試驗條約時，中國指責兩個超級大國相互勾結，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國成功進行一次核子試驗，布里茲涅夫乃將中國視為危險的對手，並將遠東和西伯利亞駐軍增加一倍，研擬對中國甘肅核子基地及其他工業基地進行核武攻擊的方案，並在新疆煽動民族動亂，企圖在中國領土上建立一個緩衝國，一九六九年毛澤東指示四位卸任元帥對變動的國際形勢進行分析，得出莫斯科正致力與中國開戰，故蘇聯乃構成中國最大的安全威脅。一九八二年五月布里茲涅夫宣布與北京改善關係之願望，中國領導人要求蘇聯消除蘇軍佔領阿富汗、在中蘇邊境和蒙古之部署、蘇聯支持越南占領柬埔寨等造成中國安全挑戰的雙邊關係改善之三大障礙。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成為蘇共總書記後，將新思維引進蘇聯外交政策，一九八七年蘇聯開始糾正陷進阿富汗的災難，一九八六年七月，蘇聯允諾減少在亞洲部份駐軍水準，一九八七年從蒙古撤出一個師的兵力，並根據與美國達成之中程核子武器協議，從中蘇邊境撤除 SS-20 及其他類型的中程導彈，一九八七年中蘇就東段邊界達成初步協議，一九八八年進一步削減邊界兵力。此外，戈巴契夫設法取消在越南的海外軍事投資，並就柬埔寨與中國進行直接談判，要求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同註 6，頁 85-110。

張中國可運用俄羅斯市場並遏制西方勢力擴張。⁸⁸

一九八九年五月戈巴契夫赴北京訪問，正式達成中蘇關係正常化，蘇聯瓦解宣告戰略三角消融，蘇聯崩潰為中國領土完整提出新的挑戰，⁸⁹在新的戰略形勢下，中國透過高峰會議、政治代表團互訪、軍事交流，加強中俄關係。蘇聯解體後，兩國在北約東擴、導彈技術控制體制（MTCR）立場一致，中俄關係穩步發展，不斷改善。中俄關係的發展從一九九一年底到一九九三年，由中蘇關係平穩過渡到中俄關係的平穩過渡，確定新形勢下相互關係的基本原則，雙方都視對方為「友好國家」，並決定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睦鄰友好和互利合作關係。一九九四年九月江澤民訪問俄羅斯期間，中俄雙方所發表的《關於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將戰略導彈瞄準對方的聯合聲明》以及兩國國防部長所簽署的《關於預防危險軍事活動的協定》。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隨著俄羅斯對外政策的不斷調整，中俄關係在俄羅斯整個對外政策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明顯提高，雙方建立「面向廿一世紀的建設性夥伴關係」，兩國的雙邊關係，在國際領域合作等方面都取得進展。一九九六年四月葉爾欽第二次正式訪問中國大陸，雙方開始建立和發展「平等信任的、面向 21 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⁹⁰

江澤民於一九九七年四月廿三日在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演講時指出，中國政府十分重視發展同俄羅斯的睦鄰友好關係，中俄兩國正致力於建立和發展平等信任、面向廿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這種新型關係，只是雙方的協作友好關係，而不是結盟關係。他不針對任何第三國，更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他有利於維護本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中俄兩國領導人的定期接觸與交往已經制度化，政府間的熱線電話很快就要開通，兩國議會的聯繫與交往不斷加強。中俄兩國擁有四千多公里共同邊界，其中絕大部分已經用法律的形勢確定下來，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正在逐步得到解決，這將為增進相互信任、促進睦鄰友好奠定堅實的基礎，中俄都是國際上有著重要影響的大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肩負著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重大責任，雙方對許多重大國際問題有著一致或相近的看法，在處理全球與地區事務中正在積極加強協調與合作，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已經宣告成立，這對擴大兩國民間的交往，增進兩國人民的理解與信

⁸⁸ Michael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25-232. 同註 6。

⁸⁹ 同註 6，頁 85-105。

⁹⁰ 江澤民，「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144-145。

任將會發揮重要作用。⁹¹

中國將中俄關係詮釋為一種新型的國家關係，主要具有兩個顯著特點。第一個特點是中俄兩國在地理戰略上對彼此生死攸關之安全利益均形成威脅，故在平等、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內政，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互利合作關係；中俄新型關係的第二個顯著特點在於，中國評估中美關係發展不會一帆風順，同時亦希望推進世界多極化格局，建立國際新秩序，故希望聯俄制美，但又唯恐引起美日等大國及周邊國家猜忌，故強調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⁹²二〇〇一年上半年中俄兩國實現副總理、外交部長、國防外長以及其他方面領導人的互訪以及兩國元首就一些重大國際問題的熱線電話交談。二〇〇一年七月五日中俄兩國元首利用赴塔吉克首都杜尚別出席上海五國首腦會議之機進行會談，在雙邊關係和國際問題達成廣泛共識，將五國會晤制度化。二〇〇一年七月十七至十八日普丁將中國作為亞洲之行的第一站赴中國大陸訪問。兩國簽署北京宣言和兩國關於反導問題的聯合聲明，全面闡述在廿一世紀進一步發展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基本原則和重大國際問題的共同立場。確定兩國共同反對美國 NMD 計畫，進一步加強兩國經貿和科技合作的的方針。⁹³

茲對一九九〇年代中俄兩國在邊境安全、軍事交流及貿易等方面之互動說明如下：

1.邊界安全問題

一九九一年中俄兩國簽訂邊界東段協議、一九九四年簽訂西段協議，儘管兩協議均獲得俄國杜馬 Duma 通過，但東段協議遭到俄遠東當地官員反對，並抱怨莫斯科將有價值的土地奉送中國；一九九二年葉爾欽訪問北京締結裁軍、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及系列交流協議；一九九四年莫斯科與北京同意不將核彈瞄準對方、部隊調防與軍事演習要事先通知對方，兩國國防部長及三軍首長間進行交流探討戰略問題。在戰術層次，邊界指揮官互相視察對方陣地，以降低意外衝突風險；一九九六年高峰會談中，葉爾欽、江澤民和吉爾吉斯、塔吉克和哈薩克領導人在上海簽署《在五國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協定》《相互裁減軍事力量協定》等一系列信心建立措施相關協議，五國同意就邊界沿線軍隊和設備部署交換情報，將邊界一百公里以內的大型軍事演習限制到每年一次，事先通知對方，並

⁹¹ 江澤民，「為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而共同努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頁 2473-2474。

⁹² 倪孝銓，「1996-1997 年俄羅斯形勢報告」，戰略與管理增刊，北京，1997，頁 50-64。

⁹³ 同註 45，頁 42-44。

邀請觀察員前來觀看。中俄兩國軍隊之邊境部隊並舉行救災等聯合軍事演習。⁹⁴一九九七年七月江澤民與葉爾欽宣布簽署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聯合聲明，完成中俄邊境東段國界勘界工作，使兩國建立面向廿一世紀的戰略協做夥伴關係進一步加強。⁹⁵

2. 軍事交流方面

在冷戰後亞太地區各主要大國意圖尚不明確，所以在亞太地區出現戰略的不確定性，導致區域軍備競賽，各國強化海空軍現代化。中國為彌補高科技武器研發之落後情況，積極向先進國家採購武器裝備。⁹⁶在天安門事件後，西方各國紛紛中止向中國輸出軍文兩用科技，但俄羅斯在蘇聯時期業已建立龐大的軍工複合體，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亟需中國的民生消費品和硬通貨，而中國需要俄軍事科技，於是除以色列之外，俄羅斯成為中國國防工業升級換代所需技術以及先進武器的主要供應者，中國的強勢貨幣成為俄國國防工業收入的主要來源。⁹⁷

一九九〇年代俄羅斯乃中國進口先進戰鬥機，驅逐艦和攻擊潛艇，獲取生產技術主要來源。中國向俄羅斯購買戰機的交易談判始於一九九〇年，第一波為24架SU-27戰機，其性能相當於美國的F-15戰機，該採購主要係對台灣獲得F-16戰機之回應，中國花費10億美元。一九九二年葉爾欽訪問中國大陸時簽署五年軍事合作計畫協定，內容包括中國向俄羅斯採購運輸機、防空飛彈、戰鬥機引擎、傳統潛艇，俄羅斯同意出售四艘636基洛級Kilos潛艇，該艦具有靜音科技，此項採購可提升共軍反潛戰力，並強化中國對南海之相關訴求，具有對台海水面艦攻擊並進行封鎖的能力。⁹⁸

在一九九四年據估計約有一千名俄羅斯核子、飛彈等高科技專家獲得高薪應聘，在共軍兵工廠工作。一九九五年十月，劉華清、傅全有訪問俄羅斯，完成新一批72架SU-27戰機交易，總值20億美元，該機型具有遠程戰鬥力及航母起降能力，並獲得在中國生產的許可，使中國在航太工業超音速戰機生產技術上取得突破。俄羅斯並提供殲十戰機相關生產技術，其他機型的雷達系統，中國陸續從俄羅斯取得蘇愷廿七、現代級驅逐艦和基洛級潛艦，一九九六年五月葉爾欽再

⁹⁴ 同註 92，頁 50-64。同註 6，頁 105-107。

⁹⁵ 同註 90。

⁹⁶ 天安門事件前，中國亦曾努力獲取法國、英國、美國等國軍事科技，但主要的困難在於每件交易均需獲得國家安全審查認可。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op. cit., pp.225-226.

⁹⁷ 如劉華清便曾指出，中國應有選擇性重點採購海空軍先進武器，期能在國內自製生產，以縮短產品差距。一九九一到一九九四年中國在發展中國家武器採購協定排名第六，達到四十五億美元，而在武器投射系統採購方面，排名第八，獲得廿億美元武器進口，但進口數量仍然低於日本、印度和台灣。以色列乃少數願意將軍事高科技轉移給中國的西方國家。同註 92，頁 50-64。

⁹⁸ 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op. cit., pp.226-227.

度訪問中國大陸，兩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雙方簽訂軍事和民用航空領域合作協議，一九九九年六月決定自俄羅斯進口 40 架 SU-30 戰機，並曾論及自俄羅斯採購颱風級 Typhoon-class 核動力潛艇，該潛艇可攜帶 SSN-20 導彈。一九九七年中國再獲得俄羅斯出售反艦導彈、兩艘現代級驅逐艦、一座防空飛彈系統。⁹⁹

此外，中俄兩國軍隊之邊境部隊和邊防哨卡亦加強友好往來，舉辦經常性的參觀、訪問活動，舉行救災等聯合軍事演習。¹⁰⁰

3. 經貿交流方面

根據中國學者評估，廿一世紀初俄羅斯的經濟必然會開始復甦，屆時中國可以提供俄羅斯龐大的市場，此點是西方國家所無法望其項背的，因為中國佔有地理上的優勢，加上中國一直對俄羅斯的貨物有需求，中國將可成為吸收西伯利亞化工、冶金與能源產品的重要市場，以支援俄羅斯東部地區的開發計畫；再則中國可從雙方關係改善中獲得軍事事務利益。¹⁰¹

自一九九〇年代起，中俄兩國邊境貿易逐漸活絡，一九九五年七月，兩國簽署一項包括在遼寧省建立一座核電廠的技術轉讓協議，使中國成為俄國機床和其他工業製品的主要市場。¹⁰²

葉爾欽在一九九六年四月訪問中國大陸期間，兩國領導人表達希望兩國貿易額到二〇〇〇年能達到 200 億美元的遠景目標。此後，為了實現此一目標，兩國政府採取包括增加大型生產合作項目和加強兩國銀行間合作的具體措施。一九九六年十二月，雙方達成兩國共同建設從伊爾庫茨克經蒙古到達中國山東省的石油和天然氣管通協定。李鵬訪俄期間，雙方並在能源、機械制造、航空航天、運輸、農業和軍事技術等領域大型項目合作達成了幾項重要的合作協議，其中包括建設連雲港核電站框架合同原則協議，俄羅斯向中方提供兩台 100 萬千瓦的核發電機組，以及中國人民銀行與俄羅斯聯邦中央銀行合作協議，兩國並在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框架內，建立常設的經貿和科技合作分委會、能源合作分委會和運輸合作分委會。¹⁰³

俄羅斯在冷戰結束以後，積極鞏固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加強俄中在朝鮮半島和東北亞地區合作力度，構築俄中朝韓四邊結構抗衡日美軍事同盟，以東線進攻來抵銷和緩解來自西線的戰略壓力，中俄雙方並在反對 NMD 和 TMD 問題

⁹⁹ Ibid.

¹⁰⁰ 同註 92，頁 50-64。

¹⁰¹ Michael Pillsbury, op. cit., pp.227-228.

¹⁰² 同註 6，頁 107-108。

¹⁰³ 同註 92，頁 50-64。

上達成共識。¹⁰⁴一九九六年四月中俄發表面向廿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上海五國會議簽署裁軍協議，確有助中國將防禦重點轉移，其前後已將兩個集團軍約十八萬人從北京軍區調至南京軍區，戰略焦點亦從中俄邊界轉向台海。¹⁰⁵

但俄羅斯身為大國的架構及實際力量所組成因素並未消失，俄羅斯仍擁有不容小視的強大核子武器與軍隊。雖然俄經濟民族主義者主要矛頭指向歐美，但部分極端民族主義者散佈中國正將人口與經濟力量擴張至俄羅斯境內，中國發展已對俄羅斯構成威脅之論點，雙方從實物交易向現金交易轉變，顯示俄羅斯對自己成為中國低劣消費品傾銷地非常不滿。中俄兩國百分之九十九的邊界問題已獲得解決，但部份俄羅斯地方部隊與政治人物阻擾邊界劃定問題。俄前國防部長格拉喬夫（Pavel Grachev）曾指責，中國公民正在和平地征服俄遠東地區，俄聯邦移民局長亦曾警告，中國人的擴張必須終止。故中俄關係仍潛存變數，中國仍不敢忽視俄羅斯復興可能帶來的長遠危險。¹⁰⁶

（三）日中睦鄰友好合作關係

日本是一個生機勃勃的社會，雖然其常備兵力有限，但一九九四年編列一百五十億美元的軍事預算，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經濟居世界第二位，並掌握一些先進的技術。日本位居中國近鄰地區，不可避免要影響中國的軍事、經濟安全利益。¹⁰⁷

中國與日本的關係與其他國家相較，歷史偏見與誤解為兩國關係塗上濃重的色彩。¹⁰⁸中日關係存在歷史問題、台灣問題、領土問題、相互信賴問題，以及中

¹⁰⁴ 同註 10，頁 88-90。

¹⁰⁵ Joseph Yu-shek Cheng, *op. cit.*, pp66-70.

¹⁰⁶ Michael Pillsbury, *op. cit.*, pp.229-230.同註 6，頁 108-109。

¹⁰⁷ 同註 23；同註 17，頁 179-181。

¹⁰⁸ 在中國的外交政策中，日本總是佔據關鍵位置，一九五〇年二月中、蘇條約即著眼於日本的威脅，當時美日合作乃美國企圖包圍和削弱中國的關鍵。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後，中國強調與日本和平共處，且仍試圖與日本社會黨和共產黨攜手，對自民黨施加壓力，周恩來曾力促中日建交，日本亦準備回應，但在美國壓力下回絕中國的提議，一九五七年日本首相岸信介採取強硬對華政策，並赴台灣進行國事訪問，一九六七年佐藤榮作首相再度赴台灣進行國事訪問。北京不時在日本面前搖晃中國市場的經濟誘惑，以中國貿易關係做餌，企圖誘使日本與北京建交，從一九五〇年代中葉開始雙方貿易額逐漸擴大，但日本極度依賴美國保障其安全和經濟增長，以致在對華政策上不敢偏離美國政策，致北京的經濟外交失敗，日本最終決定與中國建交之動力並非來自中國對日政策發展，而是源於美國對中國政策取得進展，在一九七二年受到尼克森震盪，日本即進行政策調整，一九七二年七月開始與中國進行關係正常化談判，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赴中國訪問，中美和解改變中日的安全關係，在此時期，中國視美日為抗衡蘇聯的力量，並將美國對日本的防衛保護傘視為日本面臨蘇聯威脅而不致重新軍國化的保證，當一九七八年蘇聯與越南合作達到高峰時，日本基於保護其海上能源、食物和貿易管道，乃與中國簽訂和平協議，表明兩國譴責蘇聯擴張的霸權主義。同註 6，頁 147-151。

美日三角關係等問題。¹⁰⁹一九八〇年代中日共同面臨蘇聯之威脅，兩國頻密進行高峰會談、政治磋商，為友好的外交提供基礎。從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年日本對華的低息貸款超過一百七十億美元。但中國領導人並未忘記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得潛在危險，日本防衛預算雖低於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一，到一九八〇年代末，日本各項武器都優於中國武力，唯一的例外是核武，日本已研製核武項目的所有要素，只差未完成裝配和試驗；中國領導人對日本力量的增長，備感憂慮，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針對日本領導集團對軍國主義的支持，中國曾發動攻擊批判。此外，中國對日本對台政策之關注僅次於對美國對台政策之關注，因為中國領導人懷疑日本在台灣問題懷有戰略目的。一旦日本出現支持兩個中國的跡象，中國就會進行口誅筆伐。在一九八七年中國對日本增加防務預算亦掀起批評浪潮，視日本為中國主要區域對手。中日兩國除釣魚台領土主權爭議外，同時是爭奪亞太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日本對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南韓之援助和投資乃各該國家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故具有決策影響力。¹¹⁰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李鵬訪日，雙方達成共識，確立兩國面向廿一世紀的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合作關係。¹¹¹但綜觀一九九〇年代，中日關係發展並不平順。

1. 歷史問題

中國一直試圖操縱日本人的戰爭負罪感，迫使日本政府與北京建立良好的外交和經濟關係，一九九五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士表示，日本政府願正視和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問題。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一九九六年七月廿九日赴靖國神社參拜，但十一月在馬尼拉與江澤民會談時表示：日本政府承認過去歷史上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給中國和亞洲各國帶來的深重災難，對此表示深刻的反省和誠懇的道歉。一九九九年七月朱鎔基向來訪的日本首相小淵惠三表示，歷史問題是中日關係一個重大和敏感的政治問題，日方應約束少數勢力錯誤言行。小淵惠三重申中日雙方應正視歷史，共創未來；對日美安全合作問題，小淵惠三表示基於對歷史反省，日方堅持在和平憲法下走和平建國道路，堅持專守防衛政策，遵守和平憲法三原則，堅持不作軍事大國，這些基本原則今後也不會改變；並表示日方將遵循日本聯合聲明所確定的原則，堅持一中原則，不參與或支持台獨，台海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通過對話和平解決。¹¹²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底，江澤民訪日行程一直

¹⁰⁹ 同註 23，頁 33-49；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中國外交概覽：2001 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 年，頁 36-40。

¹¹⁰ 同註 6。

¹¹¹ 江澤民，「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144-145。

¹¹²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中國外交概覽：2000 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年，頁 42-44。

保持高姿態，在公開場合一再要求日本深刻反省，不要忘記對中國的侵略，引起日本人的反感，最後甚至因日本不願道歉文字納入聯合宣言，以致雙方雖發表聯合宣言，卻沒有簽字的奇特現象。¹¹³二〇一〇年十月朱鎔基訪日，重提歷史問題，並希望日本化解中國威脅的疑慮，日本首相森喜朗表示，日方將以「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精神發展日中合作。¹¹⁴

2. 軍事問題

中國一向非常擔心日本政府將中國對領土主權或國家統一之訴求，視為權威主義統治下要求改變現狀的行為，進而衍生中國威脅論或中國霸權論，導致日本對中國採取戰略遏制，並針對中國增強軍備。一九九〇年代日本調整國防戰略，提升海空軍軍力。¹¹⁵中國領導人和戰略家一向期待美日安保條約能充分發揮限制日本軍力發展，維持區域軍事穩定的功能，但中國還存有一項雙重顧慮，其認為日本國內某些勢力企圖利用美國來抑制中國；而美國也想利用日本來對付中國。故認為美日關係不要太緊但也不要太疏遠，因為一旦美日疏遠將使日本獨立尋求區域大國地位，但美日關係若太緊密，美日兩國可能聯手遏制中國崛起。一九九六年柯林頓訪日，美日簽署聯合聲明，建議賦予日本自衛隊區域性安全角色，提供美軍軍事行動後勤支援，中國高度關注此一議題。¹¹⁶

一九九〇年代中日雙方開始針對亞洲安全問題進行對話，一九九六年中日安全對話擴展到外交官和防衛官員，且兩國外長同意就釣魚台問題舉行會談，降低衝突升高風險。但當中國學者及官員被問及中日未來在安全議題上進行合作的可能性時，總不忘大談日本的潛在軍國主義問題以及日本右翼勢力日益增強的問題，故中國對日本在亞洲地區之安全倡議一概以負面對之，如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日本首相宮澤喜一曾提出比照歐洲安全合作會議模式，在亞洲地區成立地區論壇，專門討論亞洲安全議題，中國未給予積極回應，並指責日本支持美國對伊拉克作戰，通過和平維持作業法，准許日本部隊參加聯合國任務係日本為重返軍國主義路線的徵候，中國非常擔心未來日本將以軍事強權的姿態扮演一個獨立的角色。¹¹⁷

二〇一〇年十月朱鎔基訪日，雙方同意擴大雙邊安全對話機制，增加軍事交流，並簽署「關於風送沙塵的形成、輸送機制及其對氣候與環境影響研究協定」。

¹¹³ 郭瑞華編著，《中共對台組織體系概論》，法務部調查局共黨問題研究中心，台北 88.6，頁 326-327。

¹¹⁴ 同註 109。

¹¹⁵ 同註 6，頁 155-156。

¹¹⁶ 同註 17，頁 177-179；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op. cit., pp.73-75.

¹¹⁷ 同註 17，頁 177-179。

3.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乃中日關係的不穩定因素。日本企圖在其對台關係上尋求突破，並與台灣發展半官方關係，一九九〇年代日本國內親台勢力已有所成長。¹¹⁹一九九五年，日本各政黨要求加強日台外交接觸，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期間，自民黨強硬派人士對中國軍事演習作出反應，要求日本政府凍結向中國的日圓貸款，迫使日本推遲一項給予中國日圓貸款新協議；¹²⁰中國高度關注日本對周邊事態之定義是否包括台灣。¹²¹日本朝野各黨內不斷有人主張，一旦台灣海峽發生衝突，美國介入時，日本作為盟友也將對美提供支援。¹²²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底，江澤民訪日，日方拒絕在兩岸問題上載入中共的「三不」要求，以致雙方雖發表聯合宣言，卻沒有簽字的奇特現象。¹²³一九九九年七月日本首相小淵惠三訪陸時，向朱鎔基表示，日方將遵循日本聯合聲明所確定的原則，堅持一中原則，不參與或支持台獨，台海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通過對話和平解決。¹²⁴

4.貿投問題

日中關係敵對與互賴並存，雖然中國反日情緒激烈，且往往低估中日經濟關係所帶來的利益，但中日雙方在一九九〇年代均強調將歷史敵意擺一邊，而兩國貿易額年年成長，投資關係日趨密切，確已大大限制兩國在國際上之公開批評空間。¹²⁵

在一九九〇年代，日本企業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明顯增加。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統計，日本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到一九九六年九月累計達 14,662 項，協議金額達 250.04 億美元，實際投入金額為 130.5 億美元。由於日本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資金到位率高，約達 60%，居各國到中國大陸投資到位率之首；投資規模相對較大，截至一九九四年，日本企業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平均每單項為 79 萬美元；在一九九五年日本便有 1,938 家企業到中國大陸投資，製造業佔 74.4%，其中電氣機器類最多，約佔據 16%；投資地區主要集中在從大連到廣東

¹¹⁸ 同註 109。

¹¹⁹ 同註 17，頁 176。

¹²⁰ 同註 6，頁 155-156。

¹²¹ Taeho Kim, "China's Evolving Bilateral Ties in nor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gional Strategic Configuration", in Jaushieh Joseph Wu, *China Rising: Implication of Economic and Military Growth in the PRC*,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01, pp.193-206.

¹²² 同註 23；同註 17，頁 179-181。

¹²³ 同註 113，頁 326-327。

¹²⁴ 同註 112，頁 42-44。

¹²⁵ Taeho Kim, loc. cit., pp. 193-206.

的沿海地區，並開始參與中國內陸開發合作，故日本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乃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¹²⁶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日本政府決定，向中國三峽工程提供日本輸出入銀行貸款，並由通產省提供貿易保險，以支持日本八家企業集團參與此一水利工程。中日雙方並就第四批日本政府對華日元貸款第一年度的約 1,800 億日元貸款項目計劃達成協議。¹²⁷

中日關係具有高度敏感和反覆無常的特色，中國領導人經常熱情招待日本領導人，讚揚雙方經濟政治聯繫的成就，但北京卻又積極批評日本防衛及對台政策，攻擊日本核武計畫和美日安全合作。¹²⁸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分析，美蘇兩極對抗終結後，日本對中國戰略需求下降，其「靠美、聯華、制蘇」的亞太安全戰略改為「靠美、拉俄、禦華」，日本對中國之政策出現兩面性。一方面，日本基於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需，必須利用對中國的影響力，以提高自身的地位，故力求搞好日中關係；而另一方面日本對中國的安全威脅認知，已從中國是否動亂並引起難民潮，轉向中國經濟的崛起、軍事力量增強是否對日構成挑戰，所以一方面要改善並維持中日雙邊關係，另一方面要利用日美同盟及亞太多邊安全對話等國際機制對中國形成多重制約與影響。¹²⁹日本希望中國能維持內部的穩定，但一方面又干預中國的民主化與人權問題；日本提供協助以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但一方面又對中國設限；日本歡迎中國參與國際社會，但一方面有設法削弱中國對鄰國的影響力；在安全議題中散佈中國威脅論；並干預中國對南沙群島與釣魚台群島的主權。¹³⁰

二、參與區域安全機制

（一）傳統認知

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前，由於中國領導者懷有弱國慘遭犧牲的恐懼感，故非常重視其主權，但另一方面，中國領導者雖自我體認中國目前並非是一個強國，但外界認為中國懷抱一個大國的驕傲與野心，所以在參與國際安全體制運作上，是個麻煩的夥伴。北京常以蠻橫的態度干預雙邊或多邊協議，例如北京只有在一再對抗與制裁後，才同意遵守飛彈科技管制協定，並抗議該協定在創立之初

¹²⁶ 劉江永，同註 23；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 著，同註 17，頁 179-181。

¹²⁷ 同上。

¹²⁸ 同註 6，頁 159-160。

¹²⁹ 同註 23。

¹³⁰ 同註 17，頁 176。

將之排除在外。¹³¹

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前，中國領導人堅持國家主權、平等及和平解決爭端等原則必須獲得尊重，且由於區域內部之戰略、文化和政治經濟多元化，不可能透過單一體制進行合作。中國認為東方的國際秩序概念係以和平共存，反對強權政治為基礎，此一概念較適用於亞太區域安全；而西方層級結構體系的國際秩序概念不適合東亞地區，故中國領導人偏好透過簽訂邊境協定、軍事合作聲明，友好與相互尊重等雙邊體制解決區域安全問題，對區域多邊安全架構，持反對態度。¹³²中國反對美、中、日三邊對話，主張分別與美國、日本進行雙邊對話，因為中國擔心在對話過程中美國與日本採取一致立場，向中國施壓。¹³³

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雖然中國領導人仍不願意任何一個國際共同體或超國家體制可以明顯對中國參與該體制之行為具有顯著的影響力。但北京業已體認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爭取較長時期的國際和平環境是可能的，世界範圍內科技革命突飛猛進，經濟繼續增長，為中國提供有利的外部條件。而改革開放為現代化建設創造了良好條件，開闢了廣闊的市場需求和資金來源，中國經濟高速成長已經形成可觀的綜合國力，這些都是今天擁有而過去不曾或不完全具備的條件，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和大好機遇，江澤民乃於中共「十五大」報告中表達，中國要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充分發揮中國在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組織中的作用。¹³⁴此乃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表達積極參與多邊合作的意願，逐漸揚棄鄧小平時期的雙邊和分化戰略。¹³⁵

事實上，亞洲各國關係非常複雜，在東北亞地區，一個國家對另一國政策做出反應，會破壞其他雙邊關係穩定，如北韓國內不穩定及其對南韓的恐懼，將驅使北韓獲取核武。若日本感到形勢逼人，也如法炮製，進而驅使中國加速其防衛現代化，進一步損害日本的安全，導致一場中日軍備競賽。故任何外交或安全政策無法完全做出理性計算，因為有些非存心的結果是永遠無法估算的；再如美國增加對台軍事援助，將導致中國從俄羅斯進口更多的武器，讓日本感受到中俄戰略合作的恐懼，增加日本的防衛支出，或加強與美國的防衛合作，東北亞區域

¹³¹ 同註 15，頁 127-128。

¹³² 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op. cit., pp.230-231.

¹³³ Wu Xinbo, "Four Contradictions Constraining China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USA, 2001, vol.10.27th, pp.299-301.

¹³⁴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廿一世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1-51。

¹³⁵ 羅德明，Lowell Dittmer，「中國新領導：從分工、政治背景、與政策傾向評量」，田弘茂、朱雲漢編，同註 4，頁 60-61。

安全環境充分表現出各國間均面臨安全困境。¹³⁶而區域內其他國家非常關心中國及日本未來走向，故普遍希望美國在亞太地區持續軍事部署。美國針對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曾提出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為核心的「新太平洋共同體」構想，並以「雙邊為主、多邊為輔」的地區安全新戰略，力圖繼續主導亞太事務；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美國在馬尼拉舉行的亞太經合會上，曾提出在二〇〇〇年之前各國大幅度降低對高技術產品出口貿易壁壘之建議，獲得到各國贊同，但美國與東協各國在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方面的利益差距仍十分明顯。¹³⁷

隨著中國參與區域及全球政經體制日深，貿易保護、販毒、竊取科技、種族衝突、難民流動、政治自由主義等問題都是中國實際上業已面臨或潛在的安全威脅，不可能透過雙邊合作即能解決，中國領導人已認知到要確保邊境及主權安全必須透過跨國性合作，江澤民將多邊外交列入解決國際爭議的重要手段。謹將中國參與四方會談及東協區域論壇之歷程說明如下：

（二）加入四方會談

一九八〇年代，在東北亞區域安全問題上，中蘇處於競爭狀態，尤其北韓領導人允許蘇聯更廣泛利用北韓領空和海港，以換取蘇聯增加軍援。而美國在日韓均有駐軍，在區域安全上扮演關鍵角色，故中國一直希望成為美-蘇-中戰略三角的平衡者，因為東北亞地區如發生戰爭或南北韓任何一方統一，對中國而言，都將出現一些難以控制的問題，如難民或地緣政治上的威脅。一旦北韓被南韓統一，在中國東邊國境將出現一個資本主義的競爭者；而北韓與中國在意識形態上類似，中國擔心一旦北韓崩潰將導發內戰，難民外逃，外國勢力介入朝鮮半島，並擔心北韓各種挑釁行為，故維持朝鮮半島和平穩定；提升經濟交流與合作；協助北韓政權延續；預防外在強權主導朝鮮半島；遏阻北韓難民及南韓基督徒進入吉林省；壓制朝鮮族種族主義情緒；避免在東亞地區出現反中聯盟等等，乃中國在朝鮮半島的主要政策目標。¹³⁸中國力圖排除蘇聯成為北韓的唯一庇護，保持對北韓之影響力，維持一個和平穩定但未完成統一的朝鮮半島。¹³⁹

一九九三年美國與南韓指控北韓核子設施係為製造核彈，當年二月國際原子能總署乃要求檢查北韓核設施，北韓拒絕，並宣稱退出 NPT 談判，華府、漢城、東京均擔心，一旦無法管制北韓勢將導發危機。對中國而言，維持北韓體制比朝鮮半島非核化更重要，因為中國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及東歐社會主義政

¹³⁶ 同註 6，頁 160-165。

¹³⁷ 王緝思，「1996-1997 年美國形勢報告」，戰略與管理增刊，北京，1997，頁 17-32。

¹³⁸ Sumuel S. Kim, op. cit., pp.370-374.

¹³⁹ 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op. cit., pp.76-77.

權垮台後，曾出現內外合法性危機，北韓社會主義政權瓦解，對中國內部將有重大衝擊。此外，中國對重塑北韓國家安全行為影響力有限，因為北韓認為發展核武有助南北地位平衡。¹⁴⁰故中國希望在處理北韓核武問題上首先應避免戰爭，預防敵對升高，以免引發日本和南韓被迫發展核武；再則，南韓業已成為中國主要貿易夥伴，同時亦是主要外資來源國，故應避免危及中國與南韓雙邊關係；為了不讓美國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上專美於前，所以中國主張透過對話解決，反對國際採取經濟制裁或透過安理會表決方式解決北韓問題。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一日安理會以 13 票通過 825 號決議，要求北韓重新考量退出 NPT 之宣示，中國與巴基斯坦投棄權票。

一九九四年十月，美國及北韓在維也納達成協定框架，北韓同意關閉核設施，以交換獲取西方支援建造核反應爐，並提供石油援助。¹⁴¹一九九四年十月廿一日美前總統卡特穿梭外交打破僵局，最後簽訂協定。中國曾指出卡特成功調解乃是國際政治上通過對話解決爭端甚於對立衝突的例證，並認為美與北韓達成之協定框架有利其國家安全利益，但北韓宣稱此非中國影響力作用之結果。¹⁴²

一九九六年四月柯林頓和金泳三會談，提出四方會談倡議，此一過程北京未先收到知會，且美國積極參與並介入朝鮮半島使中國非常不悅。在擬議過程中北韓曾企圖排除北京參與，中國認為北韓之提議乃不切實際、不合理、不可能。一九九七年八月在紐約首次舉行四方會談，中國在會談中抱持中立立場，對北韓提出美在南韓駐軍、美朝和平條約等議題，中國力主四國首要討論議題應在於改善雙邊關係。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六至廿一日召開第二次會議，中國以其乃唯一與三國均有良好外交關係之優勢，採取彈性平衡戰略，針對北韓提出談判座位安排之異議，中國要求以字母排序，並提議安排半天進行雙邊會談，倡議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三次會談，中國談判代表說服北韓建立次級委員會，討論後續安排問題，但後續會談因北韓潛艇入侵南韓海域而蒙上陰影。一九九八年北韓試射大浦洞飛彈飛越日本，北韓旨在警告日韓不要參與美在亞太地區建構 TMD，此亦涉及中國軍事和戰略意涵，但此舉使中國兩韓政策再次面臨困境，一九九九年五月北韓同意美專家赴北韓檢查核設施，使朝鮮半島問題暫時緩解。¹⁴³

冷戰後，中國對朝鮮半島政策進行大幅度調整，促進朝韓和解，以期實現東北亞地區緩和。中國參與四方會談的動機，主要希望藉此證明其對南北韓的影響力，避免美日等大國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具有壟斷的影響力，故積極折衝擲

¹⁴⁰ Sumuel S. Kim, op. cit., pp.393.

¹⁴¹ 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op. cit., pp.9-11.

¹⁴² Sumuel S. Kim, op. cit., pp.394-396.

¹⁴³ Ibid.

阻。充分體現中國傳統以夷制夷戰略、分而治之戰略，並透過以平衡、等距、兩手策略運用，期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效益。一方面鞏固與北韓地緣戰略基礎，一方面與南韓進行軍事交流與合作之夥伴關係。¹⁴⁴同時，進一步構築中、俄、朝一致抗衡，美、日部署 TMD 計畫，並爭取韓國保持中立，俾使朝鮮半島成為確保周邊安全的緩衝區。¹⁴⁵

（三）參與東協區域論壇

一九九一年七月，東協首次邀請錢其琛出席在馬來西亞舉行的第廿四屆東協外長會議並與東協六國外長磋商。¹⁴⁶東協國家採取此一作為，主要基於東協各國在一九九〇年代經濟崛起，在亞太經合組織、東協區域論壇、亞歐首腦會議等多邊舞台上，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東協國家體認在維持南海和平穩定與集中心力發展經濟等方面，與中國有共同利益。中國可以從和平、穩定的東南亞區域環境中獲益。故希望透過高層互訪、雙邊對話、東協區域論壇、亞太經合會及準官方第二軌會談等機制，進行安全對話，讓中國從一個革命者蛻變成現狀的護衛者。¹⁴⁷故東南亞國家領導人不斷邀請中國參與地區安全對話，但中國擔心華府或東京操縱該論壇，進而孤立中國，故在該論壇建立之初，中國抱持謹慎觀望的態度，中國領導人擔心與其他國家間之領土爭議被端上檯面討論，讓美國等其他原本不相干的大國介入調處，使問題國際化；擔心與中國有關之人權、西藏問題、武器採購等議題擴大成為區域性問題，或是將台灣問題及南海問題被納入多邊談判桌，所以，中國堅持透過雙邊機制解決問題。但此一操作方式，必然對中國在國際舞台相關議題操作形成制約。¹⁴⁸

反觀日本高度重視與東協的關係，在一九九七年，日本對東協直接投資便達到 77,937 億日元(約合 720 億美元)，當年貿易總額達 1,187 億美元。日本在加強日美同盟後，希望獲得東協各國的認可，從而使東協成為日本亞太安全戰略中可運用的力量，故在安全領域和多邊機制等領域，積極加強與東協的合作，日本希望通過東協地區論壇多邊安全對話及與東協定期首腦會議機制，打消東協各國對日警惕，確保對東協的影響，並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日本曾推出「經濟側重亞太、政治倚美入亞」的雙軌戰略，力圖構築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和東協地區論壇為核心的雙重機制；一九九六年日本外務省提出二〇二〇年以前建成「大湄公河經濟圈」設想，並將之列為政府開發援助的重點。日本報界曾

¹⁴⁴ Ibid., p.399.

¹⁴⁵ 同註 10，頁 90-98。

¹⁴⁶ 錢其琛，《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10，頁 111-135。

¹⁴⁷ Marvin C. Ott, op. cit., pp.114-115.

¹⁴⁸ Wu Xinbo, op. cit., pp.299-301.

透露，橋本龍太郎訪問東南亞與東協各國對話，主要目的在於牽制中國。¹⁴⁹美國亦逐步強化其在亞太地區之安全角色，積極在與亞太國家進行軍事結盟的基礎上，推進多邊安全協議。但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表示，我們不相信遏制中國的政策是可行的，也不相信孤立中國是可行的，對中國應採取友好而非敵視的政策，並駁斥「中國威脅論」；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強調與中國保持建設性夥伴關係。¹⁵⁰

中國領導人在參與國際安全體制雖較為謹慎，但面對中國威脅論興起之勢，中國必須在軍事現代化與區域安全間取得平衡，避免陷入安全困境。¹⁵¹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區域安全環境有助於中國領導人調整過去認為多邊安全機制乃限制中國崛起與發展的成見。基於營造和平穩定的周邊安全環境，必須化解中國威脅論之必要，一九九四年七月中國正式參與東協區域論壇。一九九五年中國發表國防白皮書，一九九六年七月成為東協正式對話夥伴：並在一九九六年參與亞太安全和合作委員會（Council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Asia Pacific）之非政府組織的多國對話機制。一九九七年底，中國與東協建立面向廿一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中國與東協十國領導人簽署中國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於二〇一〇年建成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雙方還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國與東協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等文件。¹⁵²

日本在一九九七年以後未能有效因應亞洲金融危機，使其在東南亞之影響力衰微，中國在當地影響力日益上升。中國對泰國提供十億美金援助；並向各國保證人民幣不貶值，避免新一輪競相貶值，進而強化中國在該地影響力。¹⁵³隨中國領導人參與多邊機制日漸嫻熟，且較有信心後，中國亦開始利用其作為多邊組織成員的身分，參與相關規則與規範之設定，藉以促進其政經利益，中國已成為東南亞區域經濟整合的主要推動者。¹⁵⁴

（四）促成上海五國會談

中亞地理位置恰在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乃重要的地理樞紐，戰略位置非常重要，歷來是大國競爭的場所，歷史上很少有獨立的機會，故向為強權競爭的目標，奧斯曼帝國、英國、俄國都曾在這裡展開激烈競爭，並企圖控制整個地區，中亞乃中國通向歐洲的橋梁，並擁有石油在內的重要資源，對於中國同歐洲的交

¹⁴⁹ 同註 23。

¹⁵⁰ 同上。

¹⁵¹ Michael D. Swaine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op. cit., p.118.

¹⁵² 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op. cit., pp.238-246.哈理斯, Stuart Harris, 追求強權地位的漫漫長路, 田弘茂、朱雲漢編, 同註 4, 頁 196-198。同註 146, 頁 111-135。

¹⁵³ Marvin C. Ott, op. cit., pp.114-115.

¹⁵⁴ 同註 6, 頁 182-187。

往與合作扮演重要的陸橋角色。中亞的發展將直接影響到中國的西北和新疆地區，中亞國家的興旺與繁榮將給中國西部地區的發展帶來機遇和挑戰，中亞地區的政治局勢穩定也將使中國的新疆更加安寧，隨著中國大陸經濟高度成長，對能源需求日殷，中亞地區豐富的能源蘊藏，乃中國能源管道多元化的主要標的。¹⁵⁵

蘇聯崩潰為中國領土完整提出新的挑戰，但中國立即給予新生的共和國完全的外交承認，給予中亞各國元首及政府領導人極高的禮遇。但中亞各國政治上不穩定，使基本教義派趁虛而入。中亞存在泛突厥主義（pan-Turkist）和伊斯蘭基本教義（Islamic fundamentalism），而伊朗和土耳其力圖向中亞地區輸出泛伊斯蘭基本教義和泛突厥主義，該地區種族動亂層出不窮，且緊鄰新疆。中國領導人高度關注其與當地的分離主義運動結合，以暴力方式對抗中國的統治，中國認為上述種族及分裂勢力潛伏在中亞國家內，懷疑彼等目標在分裂中國的新疆，並指該類勢力背後有西方勢力特別是美國的支持，中國與中亞等國在防止上述問題擴散，存有共同利益，故積極於鄰近國家共同合作，防止暴力事件發生。¹⁵⁶

一九九六年，中國繼續同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四國就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問題進行談判，並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就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協定及其有關文件的內容達成一致共識，簽署協定後，各方在邊境地區僅保留防禦性質部隊。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哈薩克斯坦總統那扎爾巴耶夫、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卡耶夫和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莫諾夫等五國元首在上海會晤，簽署五國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該協定確立，雙方部署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互不進攻對方，不進行針對對方的軍事演習；限制軍事演習的規模、範圍和次數；相互通報邊境 100 公里縱深地區的重要軍事活動情況；邀請對方觀察實兵演習；預防危險軍事行動；加強雙方邊境地區軍隊之間的友好交往。一九九七年四月，在莫斯科舉行第二次峰會，簽署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一九九八年在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會晤，一九九九年八月廿四至廿五日在吉爾吉斯坦的比什凱克會晤，簽署確定戰略夥伴關係基本方針宣言。二〇〇〇年七月五日在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別會晤，討論五國在共同打擊民族分裂主義、國際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以及非法販賣武器、毒品和非法移民等犯罪活動方面採取聯合行動，五國會晤已從解

¹⁵⁵ 同上，頁 85。

¹⁵⁶ 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個國家領土的總面積佔歐亞大陸總面積 3/5，其人口大約佔全球人口的 1/4。中俄是歐亞大陸兩個最大的國家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俄羅斯又是中國的最大鄰國，兩國有 4300 公里的漫長邊界。哈、吉、塔又處於中俄兩大國之間，同中國西北毗鄰，並有 3000 多公里長的邊界線。同註 6，頁 85。高華，「區域一體化進程的新進展」，李慎明、王逸舟編，同註 10，頁 185-192。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op. cit., p.77.

決邊界爭端轉向地區安全，後來又擴大聯手打擊民族分裂主義、國際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加強地區經濟貿易合作；五國的共同關注點已經從地區安全問題擴大到國際安全問題。¹⁵⁷

中國參與推動之上海五國會談機制，簽訂邊境地區建立信任措施協定和邊境裁軍協定，確實有助於中國確保周邊安全，強化中國參與多邊體制的信心，故中國學者將之詮釋為體現在平等合作、互信互利基礎上不結盟、開放、不針對第三國的新型國家關係，並視之為冷戰結束後，新安全觀之具體表現。¹⁵⁸

三、擱置主權爭議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不斷形塑主權關懷，主要基於百年來遭受強權屈辱的歷史經驗；而其政治、法制系統核心價值與西方國家不同，加上其同時面臨疆獨、藏獨、蒙獨、台獨等分裂領土主權之訴求；故其作為一個開發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於自身安全考量，強烈堅持十九世紀的主權觀，主張不得介入一國內部事務，積極防範西方以人權高於主權的原則取得國際社會廣泛認同，以免西方各國以人權為藉口，介入其國內事務。所以中國對聯合國維和行動在國際和平及安全之貢獻雖持正面評價，但由於擔心台灣問題，故主張各國不得介入他國內部事務。強烈反對北約介入科索沃問題，當主要大國希望中國說服北韓進行經濟改革時，中國便以任何國家均有選擇自己發展道路的自主權為由搪塞，並反對任何附帶條件的外援，但如此一來，不但使其在國際事務領域缺乏彈性，亦使其對來自西方各國對其內部政治改革和人權政策之批評，無法提出令人信服的回應，中國對不得介入一國內部事務之堅持，明顯與全球化背道而馳。

中國將處理台灣、香港及西藏等問題視為中國的內部事務，並主張絕不可對內部事務及國家主權做出任何讓步，也絕對沒有妥協空間，不管何時，基本原則絕不可被擊退，並認為這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基本國策。¹⁵⁹中國對於來自自由民主人士、非政府組織對中國人權、國內事務等提出質疑與挑戰時，均嚴陣以待。¹⁶⁰對以上認知與行為可從國族建構的歷程加以理解。事實上，亞洲國家雖然表面上類似西伐利亞式的民族國家形式，但因其與西方有不同的國族建構發展過程，故亞洲民族國家不像西方國家般運作則不足為奇。再則，亞洲國家內部衝突、合法性問題不像西方國家早已在國族確立後即獲得解決。另一方面，中、日、韓等東北亞國家作為一個正式的政治單元已歷經千年，成為一個具有主權的政治實體

¹⁵⁷ 該談判始於一九八九年。高華，同上。同註 1，頁 206-207。

¹⁵⁸ 同上，頁 185-192。

¹⁵⁹ Allen S. Whit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The China Quarterly*, 142, 1995, pp.295-316.

¹⁶⁰ Alastair Iain Johnston, op. cit., pp13-22.

比那些西方國家早，故其國家認同根深蒂固。對東南亞和南亞國家而言，如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家在廿世紀中葉前，仍未正式組織化，這些國家建造成現代化民族國家過程迥異於那些業已建立政治、經濟制度的歐洲國家，故存在合法性及種族及認同問題。亞洲國家與歐洲國家參與國際體系的歷史道路不同，東亞國家歷經西方及日本殖民統治，這些記憶依然歷歷在目，影響彼等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如菲律賓與美國的特殊關係，中、日、韓分別受到外國入侵及戰後的複雜歷史背景因素影響，東南亞地處印度、回教及中國文明交壤，與過去殖民統治者有複雜的關係，故彼等對外關係操作不同於西方國家。¹⁶¹

國家的發展歷程及發展階段不同，其所要突破的安全限制亦有所不同，故不同的國家領導人所企圖建構的安全威脅亦有所不同。中國目前的領土係歷史的產物，最初乃帝國向外擴張，後來是同其他國家發生衝突所界定的邊界，中國領導人與民眾均認為過去一百年來，中國在國際舞台中飽受西方列強迫害羞辱，因而強烈期望維護國家的尊嚴與領土完整，正如美國人將自己看成是打擊專制極權的勝利者。中國官員與人民也將他們自己看成是外國霸權的受害者，同時也是國家主權的勝利者。中國累積最少五代經驗的歷史觀，明顯地塑造與限制中國的外交政策。如美國對中國人權紀錄的批評，對九十年代的中國領導人而言，像是傲慢的說教與刻意的羞辱，因為他們自認為在提昇中國大陸人民生活水準與降低政治壓迫等方面已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¹⁶²中國人擔心其他國家企圖抑制中國的結論，增加中國領導人在進行國際交涉時捍衛國家尊嚴與主權的壓力。¹⁶³

中國雖然基於百年來遭受強權屈辱的歷史經驗，強烈堅持十九世紀的主權觀，不允許外界在中國的政經安全領域施加影響力，但綜觀中國在一九九零年代之政策選擇歷程，處處可見其為了維持一個和平穩定，有利於經濟發展，提升綜

¹⁶¹ 主權概念乃是歐洲歷史發展的產物，在中世紀封建時期，政治上的統治者或被統治者均是上帝的子民，受上帝和聖經律法的規範和控制，故由以上帝律法為依歸的自然法原則建立一個普遍性的法律秩序，形成一個忠誠與效忠相互交疊，而且在地理上相互交織的管轄區域和政治領土的網路。這一時期的政治組織不能被視為具有現代意義的主權國家。布丹和霍布斯的絕對主權觀提供十七世紀有限封建王權轉變為絕對王權的理論基礎十七世紀初的卅年戰爭之後，1648年簽署威士特伐里雅條約 the Treaties of Westphalia，開展人類社會的新紀元，建立一個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社會，此一威士特伐里雅體系，是一個以具有固定領土、中央行政組織和合法使用壟斷武力的主權國家為主的體系。此一絕對主權於近代被借用支持絕對主義和獨裁政府的證據，而後甚至被利用為集權主義和擴張主義的理論基礎。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民主政治與人權觀念的發展，以及國際社會的相互依存度和複雜性日漸升高，傳統主權理論於是受到挑戰和修正。然而在國家依然是人類最重要的政治組織，同時也是國際社會的主要參與者的情形下，主權概念與個人、國家和國際社會三者間的關係，有待重新釐清和界定。
<http://www.cc.ntu.edu.tw/~yang/paper-3.htm>. ; David C.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4 Spring 2003.04, pp.84-85.

¹⁶² 同註 15，頁 316-322。

¹⁶³ 同上，頁 316-322。

合國力的安全環境，不得不在主權堅持上做出讓步的現象。黎安友及陸伯彬對此提出解釋，認為根本問題在於中國既大又弱，中國幅員遼闊，但其力量又不足以隨心所欲的處理領土問題；對一些中國認為實質上純屬內政的問題，往往涉及其與其他國家關係；有些國際問題又造成國內事務反響。中國人認為純屬主權的某些問題，被外國人界定為人權或與自決權交織的問題，由於中國不夠強大，故無法對何者為內政？何者為外交問題？做出明確定義，規範國內少數民族或國際社會。¹⁶⁴

筆者認為黎安友與陸伯彬從國家相對實力不足的角度解釋中國在主權問題做出讓步的政策選擇仍有不足之處。事實上，主權乃社會建構的產物，主權國家作為最終的政治實體並非處於不受任何質疑之地位，而且國家並非是一個完整統一的主體，而是持續脆裂分化狀態，尤其當一個國家或民族面臨認同與認知分裂，亦即出現內外合法性危機時，則必須重新塑造一組對主權、認同和政治共同體新理解，國家不斷透過政策建構國家主權的內涵。¹⁶⁵介入與主權並非相互排斥，而是主權存在的條件；外來勢力的介入並非主權威脅，而是主權之所以成為可能的條件。因為，民族的我群感乃是想像的，故需作內外分野，創造他者，藉以建構自我。故國家必須不斷製造威脅，以取得建軍備戰之合理性與合法性，據以塑造想像的共同體。所以國際現實與暴力並非外在或無政府狀態的客觀邏輯發展的結果，而是國家認同建構的內部過程，即透過國家政策形塑想像的主權範圍，並區分敵我，以塑造政治的共同體，而外交政策所操弄的，並非處理目前所面臨的威脅，而是為突破未來可能的限制。¹⁶⁶所以，主權的概念並不是固定不變的，由絕對主權到人民主權的轉變，反應時空環境因素對於主權概念定義的影響，主要爭論點在於國家最終政治權利應該歸屬於統治者或是被統治者，絕對主權論者認為君主或政府應該掌握至高的政治權力，才能有效的控制政治資源與行使權力，以確保人民的安全和國家社會的穩定；人民主權論者則主張人民才是最終政治權力的來源和擁有者，絕對主權和人民主權兩者在概念上並非完全對立，主權概念是一項在主張權力歸屬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妥協，主權概念的變化亦反映國家與國際社會價值觀念和法律體系的發展。¹⁶⁷

隨著中國與國際社會接軌日深，一九九〇年代中國在處理領土主權問題的態度已有所調整，中國處理領土爭議的具體作為包括：¹⁶⁸第一、若相關爭議並非生

¹⁶⁴ 同註 6，頁 302。

¹⁶⁵ John M.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59-164.

¹⁶⁶ Ibid..

¹⁶⁷ <http://www.cc.ntu.edu.tw/~yang/paper-3.htm>.

¹⁶⁸ Michael D. Swaine .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 ’ s Grand Strategy*” , Rand, 2000, p.131.

死利益攸關者，則以達成友好合作協議方式解決，以換取更大的利益目標，如中俄關係改善之利益明顯大於邊界爭議，與哈薩克及吉爾吉斯亦如是考量，其與哈薩克及吉爾吉斯之睦鄰友合作關係主要著眼於爭取兩國不支持境內分離主義運動，此乃上海合作組織設置最重要的企圖。故邊界爭議問題得以擱置，並可獲取對持續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能源輸送管道，現階段中國與中亞國家的領土爭議已讓位於經濟發展和軍事現代化。¹⁶⁹第二、中國為確保有利於內部順利轉型之外在安全環境對於有明確爭議但無法立即解決者，則暫時擱置爭議。中國在處理與印度、日本及東協國家之領土、領海爭端採取此一原則。如一九九一年當中國取得部分島礁控制權後，對南海問題開始採取合作態度，李鵬提出「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南沙資源」的倡議，並與越南關係正常化，一九九二年七月廿二日中國接受東協對南沙五點聲明，同意不以武力改變現狀。¹⁷⁰一九九五年中國在東協區域論壇表示處理南海主權問題將尊重國際法，此相較於中國過去堅持南海乃中國領土之立場，是一種讓步。一九九六年三月中國與菲律賓就南沙問題進行第一輪副部級談判，就如何避免兩國海軍在南海問題衝突，並提高兩國高層互訪，建立磋商機制，探索兩國在南海合作的可能性。共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並就雙方建立信任措施等問題赴菲律賓、馬來西亞、紐西蘭等國訪問，中國領導人向東協國家保證其和平意圖以祛除中國威脅印象。¹⁷¹此一做法並可換取良好的國際形象，避免外界群起而攻之。第三、外界對中國處理台灣問題的理解與分析有一個誤解，認為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在台灣問題上妥協讓步，則其權力地位將不保，但誠如李潔明 James R. Lilley 所指出的，我們可以從時序上看到，美國對台出售 F-16 戰機之後沒幾個月，兩岸在新加坡進行辜汪第一次會談；而一九九五及一九九六年中國在台海進行導彈試射及軍事演習時，當美國派遣兩艘航母駛進台灣海峽附近，江澤民宣布對台文攻武嚇取得勝利，而提前結束演習，李登輝成為台灣第一位直接民選的總統，江澤民的權力地位並未不保。¹⁷²

中國在處理周邊安全方面做出上述讓步，其對內如何做出解釋，這是一個深入探究的問題。

針對中國如何處理南海爭端與持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項政策優先性安排上，鄧小平曾指出：現在除台灣佔了一個島以外，菲律賓佔了幾個島，越南佔了幾個島，馬來西亞佔了幾個島。將來怎麼辦？一個辦法是我們用武力統統把這些

¹⁶⁹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曾在領土上對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爾和緬甸做出讓步，對中印邊界曾提出妥協方案，曾承認蒙古獨立。

¹⁷⁰ 同註 6，頁 191-192。

¹⁷¹ Joseph Yu-shek Cheng, *op. cit.*, pp73-77。

¹⁷² Michael D. Swaine . Ashley J. Tellis, *op. cit.*, pp.131-133.

島收回來；一個辦法是把主權問題擱置起來，共同開發。這就可以消除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¹⁷³後來這些思想便被概括為：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十二字方針。所謂共同開發：是指兩或兩個以上國家，在國際法和國際準則指導下，經過談判並簽署協議，在有爭議的海洋區域進行自然資源的勘探與開發活動。在共同開發過程關於主權方面的原則性立場不能動搖，只是暫時放一邊，各國保持理智和克制的態度，尊重現實，依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用和平方式解決問題。中國學者認為此一戰略方針，體現中國領導人堅定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原則性，以及選擇恰當時機和方式更好地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靈活性；體現中國領導人注重與周邊國家睦鄰友好，力爭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的良好願望。¹⁷⁴

針對中國如何處理台灣問題與持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項政策優先性安排上，鄧小平曾指出台灣當局永遠不同我們談判，怎麼辦？難道我們能夠放棄國家統一？當然，絕不能輕易使用武力，因為我們精力要花在經濟建設上，統一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商大局。¹⁷⁵

針對中國如何處理釣魚台問題與持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項政策優先性安排上，鄧小平指出，這個問題我們同日本有爭議，釣魚台日本叫尖閣列島，名字就不同，這個問題可以把他放一下，也許下一代比我們更聰明些，會找到解決的辦法。¹⁷⁶

針對共軍現代化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項政策優先性安排上，鄧小平曾告誡軍隊應當服從國家建設大局，考慮如何支援和積極參加國家建設。無論空軍也好、海軍也好、國防科工委也好，都應該考慮騰出力量還支援國民經濟的發展。總之，大家都要從大局出發，照顧大局，千方百計使我們國家經濟發展起來就好辦了。¹⁷⁷此外，鄧小平亦表示，當中國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萬億美元，如果拿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一來搞國防，就是一百億，要改善一點裝備容易得很，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也會大大不同，同時其亦強調，總的是要允許吃虧，不怕吃虧，只要對長遠有益就可以幹。¹⁷⁸故共軍雖然不斷聲稱寧失千軍，勿失寸土之準備與論調，但一九九六年江澤民宣布對台文攻武嚇取得勝利，而提前結束演習，並未有證據顯示共軍反彈。¹⁷⁹

¹⁷³ 《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359。

¹⁷⁴ 同註52，頁395-397。

¹⁷⁵ 同註173，頁87。

¹⁷⁶ 同上。

¹⁷⁷ 同上，頁99。

¹⁷⁸ 同上，頁348；同註52，頁282-283。

¹⁷⁹ 哈理斯(Stuart Harris)，「追求強權地位的漫漫長路」，田弘茂、朱雲漢編，同註4，頁196-198。

鄧小平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談到香港問題時指出：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但如何理解中國關於主權擱置的論述，中國軍事學者洪兵指出國家的主權、國家安全乃關係到國家生存的問題，故始終放在第一位。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關係到國家發展；生存是發展的基礎和前提；發展是生存的必要條件以及提高生存質量的基本保證。鄧小平曾指出：有些國際上的領土爭端，可以先不談主權，先進行共同開發。這樣的問題，要從尊重現實出發，找條新的路子來解決。所以先不談主權絕不是不談主權，而是一個如何選擇談主權的時機和條件問題，因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談主權，往往會把事情弄僵，也會是自己付出的代價太大，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避免做這樣的選擇；在時機和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即使不談主權，往往主權問題也會自然解決，瓜熟蒂落，所以先不談主權這句話應該從策略上理解，而不應該從原則上理解。¹⁸⁰

一九九〇年代，中國基於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一個長期的和平國際環境，雖然仍將中國的國家主權和安全始終放在第一位，主要係為強調對於一切國際事務，都要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來決定自己的立場，不屈從於任何外來壓力，不同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結盟，不搞軍事集團。¹⁸¹但中國仍保證堅持睦鄰友好政策，決不改變，對與鄰國間存在之爭議問題，應著眼於維護和平與穩定的大局，通過友好協商和談判解決，一時解決不了的，可以暫時擱置，求同存異。¹⁸²

四、啟動睦鄰友好外交

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對外政策因受西方國家制裁影響，中國調整外交戰略部署，先穩固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重點開展對第三世界的外交，紮穩住中國的外交陣腳。錢其琛自中國一九八九年七月廿日至八月九日訪問波扎那、辛巴威、安哥拉、尚比亞、莫桑比亞、賴索托等國。七月廿至八月一日並轉赴巴黎出席解決柬埔寨問題之國際會議，與蘇、英、法、新加坡、日本等國外長會談，闡述中國和平解決高棉問題之立場。至九月初起，又先後訪問蒙古、埃及、敘利亞、突尼斯、約旦、伊朗、巴基斯坦等國，十月赴紐約參加第四十四屆聯合國大會，並在全體會議上發表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針之演講。¹⁸³

¹⁸⁰ 同註 52，頁 278-280。

¹⁸¹ 江澤民，「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廿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690-691。

¹⁸² 同上。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42-44。

¹⁸³ 同註 67，頁 164-168。

一九九〇年代，中國陸續與週邊國家如印度、印尼、哈薩克、塔吉克、新加坡、土庫曼、烏茲別克、越南等關係正常化，積極與周邊國家改善關係與東協國家建立全面對話的夥伴關係，一九九三年中印兩國就邊界問題達成協議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同東南亞和南亞各國的友好關係持續發展，與印尼、以色列、新加坡、南韓等國建交。與非洲、拉美國家的關係取得新的進展。中國與南韓建交並積極與東協各國改善關係乃一九九〇年代中國睦鄰友好外交重大成就。中國可以排除世界主要大國在其週邊地區施加影響力。

（一）推動兩韓政策

朝鮮半島乃中國安全環境的重要變數，中國不希望在東北亞地區存在一個對中國國家安全利益作出挑戰的國家。¹⁸⁴戈巴契夫太平洋倡議（Pacific overtures）對中國外在安全環境造成結構性衝擊，一九八八年七月七日盧泰愚宣示北方政策，中國的領導者意識到此乃南韓對中國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回應，改變中國對南韓之認知與態度。¹⁸⁵

一九九一年三月南韓提出申請加入聯合國後，鄧小平認為南韓政府和韓國企業集團有意願且有能力提供資金和科技，加速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且中韓接觸可刺激日韓、台韓在中國大陸市場競爭，可使中國在此三方中獲得較有利的貿易和投資條件。但錢其琛認為盧泰愚急於在其任內與中國建交，實現北方政策目標，故中國不能等到美日與北韓關係正常化再與南韓改善關係，中國必須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盧泰愚任期結束前，完成建交事宜。¹⁸⁶但錢其琛亦體認中韓建交的難點不在於雙邊關係，而在於中國與朝鮮的關係，中國必須讓朝鮮逐步理解和接受中國外交政策調整。事實上，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朝鮮外長金永男訪問中國，錢其琛便曾向其表示，中國正考慮與韓國互設民間貿易辦事處。一九八九下半年及一九九〇年金日成赴陸訪問，江澤民向其表達中國的建議，金日成同意。一九九一年雙方互設貿易辦事處。一九九一年五月李鵬訪問朝鮮，李鵬向金日成表示國際上大都支持兩韓加入聯合國立場，若一旦韓國單獨加入，則北韓將付出慘痛代價；但北韓若取得聯合國席位，將可獲得外交承認，並取得多邊組織援助，最後說服了金日成，金日成表示朝鮮不反對南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七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南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成為正式會員國。在此同時，

¹⁸⁴ Sumuel S. Kim, op. cit., pp.374-376.

¹⁸⁵ Ibid.

¹⁸⁶ 一九八五年四月鄧小平談及中國與韓國關係問題時指出，對中國來說中韓發展關係有需要，第一可以做生意，在經濟上有好處。第二、可以使韓國割斷同台灣的關係。同時鄧小平認為經濟上對雙方發展有利，政治上，對中國的統一有利。兩國發展關係是一著重要戰略棋子，對台、對日、對美、對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對東南亞，都有重要意義。Ibid. 錢其琛，《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10，頁 143-161。

中國認為中韓建交條件已成熟，錢其琛乃於一九九二年四月利用韓外交部長李相玉至北京參加第四十八屆亞太經社理事會機會，在釣魚台舉行中韓外長會談，雙方確定認命徐敦信為中方首席代表，韓外務次官盧昌熹為韓方首席代表。為避免因建交談判過程洩密橫生枝節，韓方建議先在北京舉行首次談判。第一次會談於一九九二年五月在釣魚台十四號樓舉行。中國提出韓國應與台灣斷交、廢約、撤館要求，韓方起先不同意，並建議將台灣在韓國大使館降為聯絡處。第二次會談亦在北京舉行，雙方持續交換意見。第三次會談於一九九二年六月在漢城舉行會談，雙方達成建交原則，草簽建交公報。中國為化解北韓疑慮，乃藉由一九九二年四月楊尚昆赴平壤參加金日成壽慶機會，向金日成通報中韓建交事宜，金日成表示希望中國能協調中韓關係和朝美關係。雖然北韓高度仰賴中國的援助，中朝關係並不對稱，但中韓建交在即，中國為體現對朝鮮的尊重，特派錢其琛再赴平壤向金日成報告，金日成聽完錢其琛轉達江澤民口信後，表示朝鮮理解中國獨立、自主、平等地決定自己的外交政策。一九九二年八月廿四日上午九時，錢其琛與韓國外長李相玉在北京正式簽署中韓建交公報。¹⁸⁷中韓雙方達成之建交條約，反應不對稱的相互合法性交換，漢城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以交換北京接受兩韓政策，並將原台灣在韓館產約 17 億美元交予中國。¹⁸⁸

中國對外工作領導小組報告指出，中國與南韓建交乃一石四鳥，因為中韓建交造成台灣外交孤立，擴大中韓經濟合作，削減北韓無止境的援助要求，同時，中韓建交可提升北京面對美國祭出 301 條款時抵抗美國談判壓力。¹⁸⁹

（二）改善與東協各國關係

東南亞和南亞乃相互獨立的地區，各有其戰略動態特點；東南亞乃各種文化、宗教、語言與種族融匯之地，更有獨特的殖民歷史，美、俄、日、中均尋求在此發揮政、經及文化影響力；中南半島亦是大國衝突的焦點，中國看待此一區域如同美國看待拉丁美洲、俄國看待東歐。在中國的安全環境認知上，當任何一個大國控制上述地區時，中國都視之為威脅，所以中國不斷尋求將大國勢力排除在中南半島之外，而一旦該大國及其盟國同時控制東北亞時，則中國將受到包圍，中國在東南亞區域安全政策旨在阻止類似情況發生。

一九八九年初印尼外長阿拉塔斯透過印尼駐聯合國代表蘇特雷斯納大使，面告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鹿野，表示印尼將全力促進中印復交進程。中國於是向印尼表達，中國外長錢其琛將以特使身分於一九八九年二月廿三日至廿五前往日

¹⁸⁷ Ibid.

¹⁸⁸ Ibid.

¹⁸⁹ Sumuel S. Kim, op. cit., pp. 377-382.

本參加裕仁天皇葬禮，希望藉此安排兩國外長會談。印尼常駐聯合國大使通知印國務部長木黎澳諾將陪同參加天皇葬禮，可與中國外長會談。二月廿三日下午雙方在東京帝國飯店會晤，印尼並安排錢其琛與蘇哈托會面，雙方同意進一步採取措施，透過兩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進行具體商談，實現關係正常化，一九九一年八月八日兩國恢復外交關係。¹⁹⁰

一九九一年十月與新加坡建立外交關係，使得一九九一年代新加坡並未大肆叫囂中國威脅論，反而強調地區穩定需要遷就中國利益，而中國推崇新加坡的威權主義政府與經濟發展結合，並經常向其領導人討教。¹⁹¹一九九一年七月，東協首次邀請錢其琛出席在馬來西亞舉行的第廿四屆東協外長會議並與東協六國外長磋商。一九九一年九月中國與汶萊建交，中國實現同東協成員國全部建立外交關係目標。一九九四年七月東協接納中國參加東協區域論壇。一九九六年三月中國與菲律賓就南沙問題進行第一輪副部級談判，探索如何避免兩國海軍在南海衝突，並提議兩國高層互訪，建立磋商機制，唐家璇與菲律賓副外長塞貝里諾就中菲南海領土衝突進行交涉，達成共識，緩和中菲緊張關係。¹⁹²熊光楷並就雙方建立信任措施等問題赴菲律賓、馬來西亞、紐西蘭等國訪問，讓大部分東南亞國家體認在維持南海和平穩定，集中心力在經濟發展之議題與中國有共同利益，中國領導人並向東協國家保證其和平意圖以去除中國威脅印象。一九九五年中國在東協區域論壇表示對於中國處理南海主權問題將尊重國際法，此與中國過去堅持南海乃中國領土而言是一種讓步。¹⁹³一九九六年七月中國成為東協正式對話夥伴：一九九七年當泰國遭受金融風暴重創後，中國表示願意出資十億美金加入支援泰國經濟重建工作，中國並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受到泰國等東協國家好評。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國參加在吉隆坡舉行之東協非正式首腦會議。錢其琛發表題為「發展合作才能獲得和平與繁榮」講話，闡述新的安全觀念和維護和平的新途徑。¹⁹⁴一九九七年底，中國與東協建立面向廿一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¹⁹⁵一九九九年二月五日至三月二日，越共總理黎可漂訪問中國，發表聯合聲明，提出

¹⁹⁰ 印尼與中國早於一九四九年即建交，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來出席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闡述中國對外關係堅持執行和平共處五原則。周恩來並與印尼簽署關於雙重國際的條約，當時印尼亦主張中國應取得聯合國席位。一九六五年九月印尼發生九三事件，印尼總統警衛部隊第三營營長翁東中校為首的一批軍官，以陸軍將領委員會發動軍事政變，印尼隨即鎮壓和清除印共和親蘇加諾總統的政治勢力，印尼軍方指責中國策劃並支持九三政變，干涉內政，並曾派軍隊搜查中國大使館商務處。一九六七年十月卅日兩國外交關係中斷。一九七三年以後東協與中國關係從相互敵視走向友好合作，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相繼與中國建交，印尼為東協之首，中印兩國關係乃中國與東協關係的關鍵。同註 146，頁 111-135。

¹⁹¹ 同註 6，頁 185。

¹⁹² 同註 67，頁 273-274。

¹⁹³ Joseph Yu-shek Cheng, op. cit., p.73-77。

¹⁹⁴ 同註 67，頁 271-273。

¹⁹⁵ 同註 146，頁 111-135。

中越兩國「長期穩定、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全面合作」面向新世紀發展雙邊關係之新方針，並爭取在二 年之內解決北部灣海域劃分問題。¹⁹⁶

在此期間，中國與馬來西亞兩國日趨合作，貿易和政治聯繫逐步擴展，尤其雙方在合作抵制美國逼迫亞洲發展中國家迅速開放市場之舉動，並共同致力於形塑亞洲價值。¹⁹⁷中泰兩國關係持續熱絡，軍事關係密切，兩國經常舉行高峰會談，進行軍事領導人互訪。¹⁹⁸中國至今一直是緬甸主要武器的供應者，中國透過此一聯繫維持南疆穩定，一九九 年代中國邊境省份與緬甸貿易熱絡。¹⁹⁹此外，中國針對周邊國家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疑慮，適時公佈國防白皮書。

五、公布國防白皮書

軍事透明化有助於降低潛在對手懷疑，澄清意向，但中國認為不可能有絕對的透明化，中國反對不考量國家實際條件，而一味追求軍事透明化，因為如此一來可能曝露軍事落後國家的弱點，限制其嚇阻能力。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中國加強軍事保密的態度是合情合理的，中國也必須明白缺乏透明度是要付出代價的，由於中國軍隊缺乏透明度，所以通常必須對中國的軍事動向進行揣測，基於保險起見，人們往往對中國的軍事動向作最壞的打算，中國加強軍事方面的保密代價就是人們很容易製造中國威脅論。²⁰⁰

但中國面對廣泛的國際規範及鄰國壓力，仍選擇性作出妥協，在亞太地區澳、加、日、紐、星、南韓、美國均已分別提出國防白皮書，並行之多年，泰國於一九九四年提交，印尼一九九五年公佈，此外，菲律賓及越南均接受此一提議。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美國防部長裴利訪問中國，要求中國提出國防相關白皮書。一九九五年東協區域論壇要求各成員國提交國防白皮書，鼓勵各國進行政治性安全合作對話，增進國防軍事高層接觸，要求成員國提出年度國防政策說明，並向中國提出強烈要求。

中國乃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發表一份卅四頁的中國軍備控制和裁軍白皮書，公佈中國參與非擴散、軍備控制、裁軍議題等資料，其內容均已見諸公開報導。就軍事透明化而言，白皮書內容乏善可陳作用有限，但其具有象徵性意義，代表中國官方採取透明化作為軍備控制和信心建立機制的必要手段。一九九六年一月中日進行第三次雙邊安全對話，中國表示願意再提出國防白皮書，該承諾至

¹⁹⁶ 同註 67，頁 273-274。

¹⁹⁷ 同註 6，頁 184-185。

¹⁹⁸ 同註 6，頁 186。

¹⁹⁹ 同上。

²⁰⁰ 同註 12，頁 196-197。

一九九八年才實現，該稿由總參二部結合國際戰略研究所、軍科院負責起草，提交外交部認可，最後經軍委會和國務院核定發表。²⁰¹該份國防白皮書範圍更廣，包括國際安全環境，國防政策，國防建設，國際安全合作，軍控和裁軍，並描述中國新區域安全觀，比第一份國防白皮書提供更多的新資訊。²⁰²

就中國提交國防白皮書的時間分析，一九九五年國防白皮書公佈之日期恰逢美助理國務卿奈伊（Joseph Nye）抵陸訪問，內容主要回應東協區域論壇要求東協各國提出白皮書。而一九九八年第二份國防白皮書提出的時間與東協部長會議和第五屆東協區域論壇在馬尼拉舉行時間巧合，表示中國在意東協鄰國對其軍事透明化看法。加以熊光楷擔任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其採取開放領導形式，並注意與西方建立軍事關係，故外在壓力特別是東協區域論壇乃中國釋出白皮書重要因素。²⁰³

一九九八年印巴進行核試，印度聲稱，其發展核武意在嚇阻中國，於是一九九八年六月由中國主導，邀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發表譴責印巴核試之共識文件。²⁰⁴

中國參與軍控及透明化機制立場雖屬被動因應，其所提供的資料非常有限，且通常在壓力或面臨明顯的國際共識才參與。但由於中國日益關心其國際形象，故在亞太國家的促動下，出版國防白皮書，此證明儘管中國內部仍有主權至上論及民族主義限制，但中國政府已踏出參與軍備控制和查證體制的步伐。

小結

一九九〇年代中國黨政軍領導人認為，中國周邊地區熱點問題逐漸降溫，但仍存在爆發危機的可能，而這些安全威脅包括朝鮮半島爭議、美日軍事圍堵、領土主權爭議、中印爭端，美國在亞太地區部署戰區防禦導彈等問題。

在朝鮮半島爭議方面：東北亞各國因歷史與國家認同等因素而衍生敵對，可能掀起高科技軍備競賽，其安全環境日趨複雜。一九九四年核危機和一九九八年導彈危機中，中國領導人認為朝鮮半島安全情勢若出現快速變遷則非常危險，可能轉變成衝突、戰爭，對韓國人而言是災難，此亦威脅中國安全，危及亞洲甚至世界安全，故具重大危害性和急迫性。

在美日軍事圍堵方面：一九九六年日美在台海爆發緊張關係後首腦發表《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中國領導人認為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擔心日本的角色

²⁰¹ Bates Gill, *op. cit.*, pp.266-277.

²⁰² *Ibid.*, pp.277-279.

²⁰³ *Ibid.*

²⁰⁴ *Ibid.*, pp.260-261.

與功能擴大，更高度關注美日藉軍事同盟關係共同介入台海爭端或聯合圍堵中國。在一九九〇年代中國仍是亞太區域安全穩定的受惠者，一旦美國作為亞洲地區穩定力量的信譽降低，日本可能會擴充軍力以保衛其在亞洲其他地區之利益。故中國領導人顯然過度擴大美日重新修訂防衛指針的威脅性。

在領土主權爭議方面：中國目前的領土係歷史的產物，最初乃帝國向外擴張，後來是同其他國家發生衝突所界定的邊界，而釣魚台及南海主權爭議可能爆發衝突。如果北京承認東協相關國家擁有南海部分島礁之要求，將威脅中國對其他領土爭議地區宣示立場之可信度，故釣魚台及南海主權爭議，成為中國與日本及東南亞國家發展密切關係的障礙，但中國領導人未刻意擴大上述議題的威脅性，或渲染其急迫性。

在中印爭端方面：中國對南亞安全環境的評估，主要集中在中印關係互動。對中國而言，印度具有挑戰動搖中國對西藏統治地位之能力，中國一直將印度視為爭奪南亞地區領導權的主要對手，中印兩國在東印度洋及南中國海彼此的軍事意圖與野心相互衝突。一九九八年印度核試驗時，印度稱此舉主要針對中國。中印邊界約二千五百哩未曾界定邊界，成為中印兩國能否建立良好睦鄰關係的關鍵。印度在經濟、軍事以及科技上都略遜中國一籌，然中國軍事專家指控印度企圖成為南亞霸權。如果中國對印度此種評估成為中國大陸主流想法，將升高兩國在印度洋或中印邊境上的軍事對抗。

對於美在亞太軍事部署方面：由於中國領導人將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制止大國控制周邊地區、保持有限的第二次打擊和威懾能力視為中國生死攸關利益。所以，TMD 研發構想雖然主要不是針對中國，但中國領導人對此非常敏感，尤其中國認為日本與美國一起研製與開發 TMD 系統，將為日本走向軍事大國道路創造條件，此顯然擴大該議題對中國的危害性。

一九九〇年代中國領導人針對上述周邊安全威脅，作出開展大國外交、參與區域安全機制、擱置主權爭議、啟動睦鄰友好外交等政策選擇。

在開展大國外交方面：中國有鑑於冷戰後，美、日、歐等國因經濟競爭致矛盾對立之勢，分別與美國建立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與俄羅斯建立面向廿一世紀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日中睦鄰友好合作關係。但中國與美、日、俄等國關係發展並非一帆風順，故江澤民要求「朋友還要交，心中要有數」。

在參與區域安全機制方面，中國參與四方會談，主要希望藉此證明其對南北韓的影響力，避免美日等大國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具有壟斷的影響力，進一步構築中、俄、朝一致抗衡，美、日部署 TMD 計畫，並爭取韓國保持中立，俾使朝

鮮半島成為確保周邊安全的緩衝區。此外，基於營造和平穩定的周邊安全環境，必須化解中國威脅論之必要，一九九四年七月中國正式參與東協區域論壇，並逐漸成為東南亞區域經濟整合的主要推動者。中國參與推動之上海五國會議機制，簽訂邊境地區建立信任措施協定和邊境裁軍協定，確實有助於中國確保周邊安全，強化中國參與多邊體制的信心。

在擱置主權方面：綜觀中國在一九九〇年代之政策選擇歷程，處處可見其為了維持一個和平穩定，有利於經濟發展，提升綜合國力的安全環境，不得不在主權堅持上做出讓步的現象。若相關爭議並非生死利益攸關者，則以達成友好合作協議方式解決，以換取更大的利益目標，如中國為求與俄羅斯、哈薩克及吉爾吉斯改善關係，邊界爭議問題得以擱置。對有明確爭議但無法立即解決者，則暫時擱置爭議，如中國處理中印邊界及一九九〇年李鵬提出「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南沙資源」的倡議。

在睦鄰友好外交方面：一九九〇年代中國推動兩韓政策，並與南韓建交，造成台灣外交孤立，擴大中韓經濟合作，削減北韓無止境的援助要求，並提升北京面對美國祭出 301 條款時抵抗美國談判壓力。中國加強與東協各國改善關係，化解軍事威脅論，有效防止大國勢力控制周邊地區。中國並於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發表中國軍備控制和裁軍白皮書，化解因軍事缺乏透明度，引發中國威脅論興起之勢。